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

刊叢實現與論理

編主遠志沈



馬克思主義不朽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概觀

一九四八年 歷史和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

新民主主義底歷史認識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

編者 胡繩

劉思慕著

英·希爾著

沈·方著

英·康福特著

馬·特著

徐·堅著

侯外廬著

沈志遠著

行印社版出中新



理論與現實叢刊 第二輯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特輯

馬克思主義不朽……………編者(一)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概觀……………胡繩(三)

一八四八——歷史和理論的發展……………劉思慕譯(一七)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沈方譯(三三)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英·康福特著 馬特譯(四四)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徐爾著 堅譯(五二)

新民主主義特輯

新民主主義底歷史認識……………侯外廬(五九)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沈志遠(六七)



MO
A8153₁
1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特輯

馬克思主義不朽

編者

「共產黨宣言」——全人類歷史中一個最偉大的不朽文件，自其出版迄今，已經滿了一百週年了。這一百年來，世界歷史所發生的變化是何等巨大而豐富啊。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所面對着的現實，自其基本特徵和趨勢上看，完全是一百年前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所預見到了的。一百年的世界史，嚴格說來，不過替這一偉大的不朽文件提供「實証而已」。

首先，「宣言」開始第一句說：「一個怪物徘徊在歐洲——這就是共產主義這怪物。舊歐洲的一切力量已經結成了神聖的同盟來對付這個怪物：主教和沙皇，美特涅和基佐，法國急進派和德意志的警察們。」一百年後的今天，這個「怪物」，已經早就不僅徘徊在歐洲，而是徘徊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了。聯合起來對這個「怪物」進行「十字軍征討」的，也已經不光在舊歐洲的一切反動力量，而是整個舊世界的一切時代渣滓了：羅馬教皇和日本天皇，杜魯門和蔣介石，邱吉爾和勃魯姆，加斯波里和德波汶，英國勞工黨和美國的共和與民主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的德文版序文中稱調着道：

「廿五年來環境的變化雖然很大，可是『宣言』裡所發揮的一般的原理，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七十五年前寫的「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這句話，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依然全部正確」的。而且我們相信，它將如日月經天，永垂不朽。蕭伯納在兩次大戰期間曾說過一句頗有趣味的話，他說共產黨是一切政黨中最保守的一個，因為別的政黨都在二十世紀或甚至一九一八年以後才製定或修訂了它們的綱領，共產黨却至今仍堅持着他們的一八四八年的綱領。

不錯，在這一點上確實可說共產黨是最「保守」的政黨。但是這樣的一「保守」，對於一個激進的革命者，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不僅是十分珍貴，而且還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共產黨的這種「保守性」，正是證明牠們的始祖之堅固一切的科學預先的遠大性與永久性，同時也足證明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能夠始終一貫地為牠們的理想信念，為牠們的基本綱領，不顧一切地奮鬥到底；在自己的理想和基本綱領未實現以前，牠們的奮鬥意志和鬥爭的堅定性是千百倍於鋼鐵的。道和其他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的技機取巧、搖擺不定或者把自己的政綱完全當

作窮人的「羊頭」來利用的，絕對不能同日而語。

可是這絲毫也不等於說，共產黨的綱領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乃至在任何場合都是一成不變，到處永遠一模一樣，有如聖經教條一般。說「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將如日月終大，永遠不朽」云云，只是指的「宣言」裡所提供的基本的原理原則，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宣言」對於資本主義這一最後的矛盾社會形態之必歸崩潰的預見與無產階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鬥爭目標和戰畧部署等，而並不是指它的一字一句或某一個別的論點。

在前引序文中接着這樣寫道：

「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應用，正如「宣言」本身所陳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要看現存的歷史條件而定的」。「宣言」中也強調工人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是國際性的，因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般性質是到處一樣的。但是「宣言」又特別警告人們別企圖在國際主義的幌子之下，把一套現成的公式應用到革命實踐的各種具體場合上去。依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及列寧和斯大林的意見，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不能不在民族的形式之內進行着，而這種鬥爭的形式則決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民族的傳統和民族特點是這些歷史條件中的重要因素。

因此，「共產黨宣言」中所闡發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雖將永垂不朽，但它的内容勢必隨着時代歷史條件之演變而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做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者，必須學會根據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區的歷史發展和革命鬥爭的具體客觀條件，來靈活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發展它，豐富它。為着這，對於一個革命的戰士，重要的不是熟背字句，而是緊緊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質，精神和方法。在世界範圍上，善於根據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客觀歷史要求以發展與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是列寧和斯大林。列斯二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即基本原理）靈活地應用於俄國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而得到了巨大無比的收穫——領導了一億七千萬人從資本封建壓榨之下獲得解放，勝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說，把「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一切基本奮鬥目標，都一一變成了活生生的事實。

在中國領土內，善於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客觀歷史要求以發展與豐富馬列主義的，無疑是毛澤東。毛氏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靈活地應用於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同樣地也已獲得了顯赫的成就——領導了四億五千萬人民正在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勝利。

世界歷史已經隨着反法西斯大戰的勝利結束，社會主義蘇聯影響的空前增強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東南歐和遠東的勝利發展而進入一嶄新的階段，這就是馬列主義開始全世界性勝利的階段。

「共產黨宣言」永生！馬克思主義不朽！

馬克思主義與

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概觀

胡繩

一、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

二、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

1. 洋務思想與改良思想
2. 甲午戰前的改良主義思想
3. 戊戌維新運動

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思想

1. 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
2.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
3. 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混亂

在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後七十年，中國才開始有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僅僅由於外侮作用而產生的麼？——如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會必須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才開始在中國成長；如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出現於中國也不會具有那樣重大的劃時期的意義，不會在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思想發展中成爲領導的力量，蔚爲壯闊的主流。

從鴉片戰爭以後直到現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想史應劃

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七十多年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時期，後三十年是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時期。

正當馬克斯恩格斯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時，封建中國，開始蛻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代歷史。但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還遠沒有到達能夠接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條件。七十多年間，隨着社會政治實踐的激烈波動，社會思想也經歷了複雜多樣的變化。有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有從官僚統治者的「洋務」運動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思想，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

思想。它們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起着把中國社會向前推進的力量，但實踐證明，牠們無一能解決現代中國的問題，無一能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

這七十多年間的中國社會思想的波動恰恰可以證明，中國問題的解決不能不有待於無產階級的馬克斯主義思想的出現。當現實的條件具備了，也就是，無產階級開始要成爲一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時候，馬克斯主義思想就不能不在中國出現。牠的出現就不能不是具有着結束前七十年的社會思想的波動的意義，就不能不担負起中國社會思想向前發展中的領導的和主流的作用。

一、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

會主義

百年前，當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砲和商品衝破封建中國的籬籬時，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不可避免的開始引起了波動。但作爲封建時代的文化思想的傳統承繼者的地主階級完全沒有能力來迎接這歷史的變動。鴉片戰爭的震撼只不過引起林則徐、魏禧等少數人對西方國家的堅甲利兵的羨慕和對環球輿地的初步認識。

在思想上迎接了新時代的大變動的是被目爲「無文化」的被壓迫的農民階級。

太平天國農民大運動的思想上的領袖洪秀全是在雅片

戰爭中受着激烈變動的廣東孕育起他的革命思想來的。馬克斯會說，「鴉片（對於中國人民）不會發生催眠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這是很矛盾的」。同樣的，傳教士跟着鴉片販子而到了中國，但這種精神麻醉劑却成了中國農民大眾革命思想的觸媒。洪秀全在鴉片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八四三年）仔細讀了一部基督教義的粗糙的宣傳品，以此爲基礎，他竟構成了一套思想，集中地表現出在封建壓迫下的農民大眾求解放的朦朧希望。

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和他的最初合作者在廣西開始其組織貧苦農民的工作。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時，在中國却還只有農民的素樸的社會思想在起着革命的酵素作用。洪秀全在一八四五——四六年間所寫的「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是這種思想的結晶品。「覺世訓」中開宗明義提出「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的總綱領。「醒世訓」中更給以闡明說：

『惡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尙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飢溺，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殫車煩馬，何分此邦彼邦？蓋實見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

入，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人，盡是姊妹之輩。何得容此種彼界之私，何可超爾等畛域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得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尙何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爾，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惡之鬼門，橫行上帝之真道，時感天威，力運天誠，相與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對何飛濤洩瀉之世，其不一且變而為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陰毒門殺之世，其不一且變而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怯之世也？

這種「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激動了千萬農民。一八五〇年金田耶起義後，集合了農民羣衆在革命實踐中的智慧，更把這種理想表現在一種帶着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制度的理想中間。太平天國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一八五三年頒佈)寫出了這理想。

天朝田畝制度詳細地規定了「分田」的辦法，把所有耕地按照產額之多寡分為九等，平均分配與全體農民(不論男女)。除耕地外，每家均須栽桑養蠶，畜「母雞五，母彘二」。而一切生產品除供自己需用外，均須交於國庫

，不得私有。一切婚娶生養，都由「國庫」按一樣的標準與以津貼。——這樣的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照原文中所說是：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他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贖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贖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要腰也。……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皇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勻，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已含着土地國有、財產歸公，每一個農家卻在平等地位上自食其力的平均的生活等等內容。這種思想一方面表現着中國廣大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鬥爭，另一方面又表現着以個體的小生產為基礎的農民中的落後的平均主義思想。

農民們把他們的國家叫做太平天國是很有意義的。他們不可能設想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新的生產力以建立新的國家；他們只能借「天」的旨意而幻想把他們的個體小生產單位組織成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平等自由的新社會，他們企圖把他們所想像的天上的國家，搬到地下來代替封建地主階級所統治的國家。

這樣的思想當然不可能實現。事實上，天朝田賦制度也並沒有能在太平天國勢力下的各個地區內實行。但是這種理想却成爲當時一代農民鬥爭的發動力，這種理想把上百萬企圖翻身的農民，組織成了有嚴格紀律，有狂熱鬥爭決心的太平軍，進行了十多年的激烈的戰爭——雖然最後是在地主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的聯合武力下被鎮壓下去了。

太平天國的思想的偉大歷史意義是在這裏：牠是把兩千多年來在封建時代的被壓迫農民的鬥爭要求提高到了單純農民戰爭所能到達的最高思想水平，而且這種思想轉化成爲廣大群眾的鬥爭，給了封建社會以最嚴重的致命打擊。另一方面，太平天國的思想啓發了廣大農民，掃除舊的封建統治者，不是爲了給新的統治者以地盤；一個無饑餓、無貧窮、無壓迫的新社會的朦朧理想，永遠在農民面前閃爍着。太平天國給了預約，却不能實現。新的時代展開了，從新時代的人民鬥爭中終於要產生新的思想，在現實基礎上引導農民前進。

二、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

1. 洋務思想與改良思想

太平天國經過十五年的戰爭後失敗了。封建統治集團

向帝國主義侵略者作了全盤妥協，換取得他們的幫助而才能壓倒了農民革命。在革命的風暴過去後，滿清官僚們開始了「洋務」的學習。他們設立外交機關，請外國公使入北京，學會外國公使指定要他們學會的外交規則，以便順從帝國主義者給中國安排好的地位。他們又接受外國人建議，買槍砲兵艦，辦兵工廠，來使自己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是值得支持的中國統治者。在太平天國中有了直接和外國軍隊合作「剿匪」經驗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就是所謂「洋務」的推動者。

把這種洋務運動看做是近代中國民族的自我覺醒運動的一頁是完全錯誤的。因爲這實際是封建的官僚統治集團爭取實辦化的一個運動。官僚統治集團企圖在實辦化的過程中建立穩定的秩序，却完全失敗了。底層的人民大眾的騷動不安仍然在繼續着，而中國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化的危機時時提醒着人民，連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層中也有一部分人不能不預感到這樣下去將有可怕的结果。

在這種情形下，從地主士大夫中漸漸分化出一種反對派的思想。他們多半可說是地主階級中未當權的人物，受時勢發展的刺激而對於當權的官僚集團的洋務運動感到不滿，感到有比提倡「洋務」更進一步的革新。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希冀着自己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前途。

自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失敗後二十年間，是曾、左、

李等官僚集團辦洋務最得意的時期。但在一八七二年曾國澄死後，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與新興的日本對中國的欺凌與侵畧日益加緊，以「洋務」自誇的統治集團重又感到左右支絀，這時從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思想已在萌芽。到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戰後，改良主義聲勢漸壯，又經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洋務運動完全破產，改良主義的思想便在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中到達了他的最高點。

但這種分化畢竟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絕不可能到達反對封建統治秩序的立場。最早的改良主義思想者，王韜，容閻雖曾一度去接近並企圖參與太平天國的農民政權，但他們立即發見他們和革命的農民之間的差別，他們都很快設法在自己身上洗淨了參與農民「叛亂」的「罪惡」，轉而投效曾、李之類的官僚，寧願在封建地主集團中保持反對派的思想。

但如果不分別曾李的洋務思想與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也是不對的。前者是反動的，是在塗死了農民革命後繼續起着阻止歷史進步的作用的。後者却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因為當時農民革命思想既已在殘酷的殺戮下一時衰歇下去，而現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還沒有存在。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固然還不能接觸封建社會中的基本問題像太平天國的農民群眾那

樣，更不能預見無產階級的將來，但他們在那時候，確是不自覺地為剛在萌芽的城市工商業者做了代言人。

2. 甲午戰前的改良主義思想

這樣的反對派是非常弱的，他們對封建統治集團所提倡的洋務是不完全贊同的，但不敢予以批評，而只敢給以補充；他們在實際政治上，又往往還是依附於辦洋務的大臣，他們只是在思想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最重要的是這兩點：

第一，辦洋務的大臣們都是把洋務建設集中在官僚資本的勢力下，但改良主義者則主張鼓勵和發展民間的自由企業。

第二，單純的洋務思想決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改良主義者則提出了（雖然是畏怯地）政治問題來，在政治上要求改良。

根據這兩個標準，我們可以把改良主義思想從單純的「洋務」思想中區分出來。

首先可以提到薛福成。薛氏隸身於曾國藩和李鴻章門下，他的思想基本上屬於洋務運動者，但在一八七九年所著的「籌洋緝議」一書，多少表現着改良主義的氣味。他提出發展民間的工商業為富強之本。他特別提到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認為「官本較多，萬一稍有蹉跌，

其勢難圖再舉。」婉轉地說出官僚資本控制企業的危險。他主張不妨讓商人自由經營航業。『商人有能租賃輪船一二號或十餘號或數十號者，均聽其報名於官，自成一局』。此外，他又注意到紡織工業的發展，主張政府應採獎勵的政策。『蓋開辦之初，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以示招徠。……』

在「籌洋銀議」這書中，薛福成以「變法」一章作總結，但所舉出的「變」的內容却還沒有跳出洋務運動的巢臼。（所列舉的事項是：商政職務，工藝製造，軍艦電報，兵制陣法，國際條約等）比起稍後一點改良主義的論調是遜色的。

馬建忠在見解與主張上比薛福成又進了一步。少年時在上海已學會外國文字，一八七六年到法國讀書。他對西方政治文化的認識在當時要算是最先進的。一八七七年他曾如此說明他的認識的發展過程：

『此次來歐，一職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誘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習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器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憲信齊則不如無齊之

論為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權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隱有難事則以議院為藉口。美之監國（總統）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豈至乎其難也。……」（適可齋紀言卷二）

可見馬建忠當時不但已看到單講堅甲利兵，其實是舍本逐末，而且還看出西方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虛偽面目。固然他看得十分淺，比之辦「洋務」的官僚已不知高過若干倍了。

但馬建忠的出洋和回國件事都是依托着李鴻章之類的洋務官僚，他不敢提出什麼政治主張。一八九〇年他作「富民說」，認為要使國「強」必先使「民」能「富」，并提出具體辦法三端：（一）發展絲茶等土貨生產（改良技術，合併大資本，減輕厘稅）（二）建立紡紗織布等工業以「仿造外洋之貨」。（三）開礦。總之他的主張就是以發展生產來求「民富」，以「民富」來達到「國強」。這樣的主張和洋務運動者以「洋務」來發展官僚資本的做法是相反的。馬建忠反對官僚資本而主張發展民間資本：

「界仿西國設一商務衙門，由商務衙門向外洋各國貸款二三千萬。……然後由商務衙門將前三端所舉諸大事，若金礦，若織布，若絲茶，先易後難，次第分辦。其辦理之法須以商人糾股設立公司爲根本，取具股實資本保結，而後以借款相假，義取其息以還洋款。……」（同上卷一）

這時獨立的民族工業還幾乎不存在，只有官辦的，官督商辦的，和官商合辦的若干新式企業。馬建忠的主張正是代表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最初理想。但在他的主張中也已顯示着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與無自信，除了直接由官僚統治者，間接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借款以外，不能設想自力更生的發展前途。

正因爲馬建忠抱着這樣的思想，在官僚集團中終究不能「得意」。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發生時，他自怨自艾地說：「近復爲世所忌，摺斥家居。」（同上卷四）

馬建忠這樣的主張在當時漸漸地在國內得到很不少的同情者。像王韜，鄭觀應，嚴復，陳虬，宋育仁，陳燾都有類似的見解。

陳燾在中日之戰前所著「庸書」中說：

「今之言洋務者曰：講求公法，整頓海防，製器練兵，購艦造廠，自以爲當務之急，而不知皆緩途也。自以爲得氣之先，而不知皆後著也。」（庸書外篇卷上）。

這很明白的，是針對辦洋務的官僚統治集團們說的。陳燾和別的上舉各人均與馬建忠一樣，以爲辦「洋務」的根本是在發展工商業。而且他們更比馬建忠進一步，提出了政治上的改良主張。他們提出建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例如：

「欲行公法，莫要於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

蓋五大洲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篇）

「泰西富強之道，在有議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陳虬）

「泰西議院之法：合君民爲一體，通上下爲一心，……

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也。」（陳燾，庸書外篇卷下）

他們都主張行選舉制度，設立議院，以改變專制主義的政治；但同時強調，「選舉雖曰從衆」，但如果不是「有財產身家，善讀書，負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舉議員」（鄭觀應），并且指明設立議院的目的無非是讓「紳商董事」經過「泰西投票公舉之法」以成立議院，得有議事間政之權（陳燾）。這就表明他們終究不過是地主階級中改

良主義的反對派，由他們來軟弱地表達了資產階級要求政治地位的願望。

3. 戊戌維新運動

甲午之戰（一八九四年）暴露了官僚統治集團的洋務運動的慘敗。改良主義的反對派更加振振有聲了。

康有為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之後，已接受改良主義的思想。甲午戰敗時，他在北京組織一千多個應考舉人聯名作「公車上書」，是第一次把改良主義思想轉化為政治運動。到了一八九八年，他居然和他的若干政府官員、地方紳士與士大夫中的同道者說動了光緒皇帝，假皇帝之力來實行「維新」。

在維新運動中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思想並沒有很多超過甲午戰前若干年間改良主義者的主張和宣傳的內容。雖然在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梁為滿清統治集團視為大逆不道，但他們的思想始終只是保持着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立場。

就一方面說，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比甲午戰前的改良派是進了一步，因為後者在實際政治中只能依附於官僚統治集團，極謹慎極有限度地提出他們的改良思想。前者却已不滿足於這樣卑微的存在狀態，進而企圖取得政權力量來大行其志。

但就另一方面說，維新運動恰恰表現了改良主義思想的軟弱性。他們終究只能幻想依靠封建統治集團中的最高皇權來取得政權力量，他們充其量只能把他們的理想變成一條條的「上諭」——如在百日維新時所作的那樣，其結果只得到一堆廢紙而已。

戊戌維新是改良主義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點，牠的失敗也就暴露了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的破產。戊戌維新的失敗為這種改良主義思想的歷史進步性敲起了喪鐘。因為在這以前，中國還沒有獨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時候，這種改良主義思想是表現着地主階級中一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理想。在這以後，雖然仍沒有堅強的新型的革命階級，但是各帝國主義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對中國的統治與侵略空前加緊，民族的危機空前迫切，這種形勢造成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下層貧民中的革命浪潮，——地主階級中的改良主義也就漸漸地改變了牠的意義，不是向統治集團要求進步，而是在革命前面以改良主義面目來保存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了。這也就是說，他們已從官僚統治集團的「反對派」而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對派」，於是他們的歷史進步性也就斷絕了。（關於戊戌維新的思想及其後來的轉為反動，參看拙著「戊戌維新與康有為」及「辛亥革命前的梁啟超」二文，見「讀書與出版」今年一月號至四月號）

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領導下的革命思想

1. 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

戊戌維新的失敗既已宣佈了改良主義的破產，而跟着，一九〇〇年（戊戌後二年）發生「八國聯軍」之役，時局的激烈變化和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更不能不在思想界中引起巨大反響。

梁啟超在一九〇一年會指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頃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滅燼代之時」。梁氏的這說法很足以表現他識見的敏銳，但他還不能夠具體看出，隨着二十世紀降臨而在中國「新」起的力量就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

梁氏又有一段話大致說出那些年來時代思潮發展的梗概：「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開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開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這段話是在一九〇二年說的。這就是說，自經一八八四年（「二十年前」）的中法之戰後，洋務運動的「西學」思想已只是陳辭濫調，而有改良主義的變法思想；到

了一八九四年（「十年前」）的中日之戰後，「變法」思想漸漸失去新鮮的力量，而有「民權」思想漸漸興起；及至一九〇〇年（「二年前」）的「八國聯軍」之役後，思想界又漸漸發生革命的思潮了。（這裡所說的「民權」自然只是梁啟超所了解的與革命相分離的「民權」。）

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把思想領導權從地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手裏奪取過來。他們在社會經濟上的弱點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們的思想上的。

第一、在帝國主義商品傾銷與官僚資本的霸佔一切的變重壓迫下，民族工商業本已絕難得到抬頭機會；自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又直接投資中國，辦廠開礦；八國聯軍之役後，更形成列強共管中國的形勢。新興然而軟弱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處此形勢下，被迫地有了初步的政治覺悟。但他們並沒有充分的自信與力量以開展自己的前途。大量的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多半出身於沒落的地主家庭中，受時勢的刺激，奔赴到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下來，但他們的理想往往充滿着動搖、波動與混亂，並不可能立刻建立明確的革命思想。

第二、因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開始時倒是和改良主義的維新思想打成一片的。如同維新思想從洋務思想中分化出來的一樣，這時期的革命思想也是從維新思想中分化出來的。孫中山在一八九四年上書李鴻章，

完全是改良主義者的論調，一八九五年成立與中會謀在廣州起義，雖已初步地提出民權思想，并強調反滿清的民族革命主張，但這時所提出的民權思想只是朦朧地憧憬着一種歐美式的「合眾政府」（共和政府）。一八九八年康梁失敗出國，與孫中山革命派同在日本，後者還企圖成立合作，並不覺得雙方間有思想原則上的區別。這時，康梁甚至也被視為革命人物。一九〇〇後，國內各大城市與海外華僑中愛國運動與愛國團體風起雲湧，滿清當局公開做帝國主義代理人，壓制愛國運動，這種情形本極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但革命派並沒有能利用這時機建立思想上的領導。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上的堅決分裂與對立是到了一九〇五年才開始公開顯露。

第三，相反的，在改良派方面倒能够聰敏地利用一九〇〇年後的廣大群眾心理浮動的時際，再建他們的思想陣地。梁啟超不愧是中國改良主義者中的最傑出的人才，他既敏銳地看出時代思潮的推移，在一九〇〇年後，他就不再專顧保皇維新變法的老調，而把自己裝成是個民權論者，革命論者。民權是他在戊戌時已經談到了的，但他所謂民權其實乃是給地方紳士以權力；而他所謂革命，却並非不要澈底推翻現行統治秩序，而讓地主紳士來用和平合法手段「革命」。正因爲革命派思想「陣營」薄弱，所以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間，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風靡

一時，他適應時勢而作的激烈論調客觀上固然也起了提高群眾覺悟的作用，但其在巧妙化裝下傳播非革命的改良主張，却也一時地達到了使革命的思想陣營混淆與削弱的效果。

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却在不斷地暴露着改良主義的破產，并暴露着假革命論的虛妄。事實證明，在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滿清政府反動統治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想望，如果要真正實現，那怕只是實現一點，也只能用革命方法，不可能用任何和平合法要求來取得。

客觀形勢的發展推進着人們的思想認識，不能不越出改良主義所劃定的範疇，而走向革命的水平。

這裏只舉一個例來表明自戊戌維新失敗後小資產階級知識商人中革命思想的醞釀。

一九〇〇年東京留學生中出現一篇署名「是中國人」的文章，駁斥張之洞的「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其中說：

「……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爲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也。……至若不受壓制，甘心流血，同捨身救民之志士之所爲，各國歷史數見不鮮者矣。試取英國之史觀之，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如何，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如何，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如何，使英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英民猶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取法國之史觀之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革命又何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又何如，使法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法民亦若注貴族之奴隸也。又取美國之史觀之，英之所以壓制美國者何若，美之所以抵抗英人者又何若。使英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美國猶印度也。取意大利之史觀之，各邦之君所以治其內者何若，法奧諸國所以制其外者又何若，使意大利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意大利猶土耳其也。是故西儒有恒言曰，列國之文明皆從流血購來。……今日中國方講英法革命以前，嗚呼受制之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蓋爲埃及印度土耳其之日久矣！……」

戊戌維新時，康有爲開口彼得大帝的新政，閉口明治維新，但現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進一步開始憧憬於英、法、美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了。

2.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

到了一九〇五年，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遭受了從革命派方面來的決定性的打擊。革命派取得了思想領導權。其時在客觀形勢上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由於反對美國對待華工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沿海各埠商人發動抵制美貨運動，這表示工商業者的自覺性更提高了。二、在一九〇五年前，除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外，國內各地有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組織興起，在其思想與行動上都已遠

超過康梁主張。到了一九〇五年七月，這些組織結合起來，在孫中山的思想領導下合成同盟會。三、滿清統治集團自戊戌後本以爲康梁是一切「叛亂份子」中的巨魁，但漸漸發現了康梁以外的革命派勢力才是他的真正敵人。爲了從革命危機中拯救自己，滿清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宣佈預備立憲。

同盟會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在日本成立，十月廿一日其機關刊物「民報」創刊。這時滿清政府預備立憲的佈置已經在進行起來了。康梁思想直接影響下的海內外的改良主義者都歡呼雀躍，以爲所要求的漸可實現。從種族感情出發的單純排滿革命論者在這時甚至有十分悲觀的，他們害怕滿清如實行君主立憲，反滿革命將永離告成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不能建立明確的革命思想，和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派嚴格區分開來，革命派的陣營勢將無法繼續前進。孫中山在這時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思想，正是適應了這個客觀需要。他在同盟會綱領中提出「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在「民報」發刊中又第一次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提了出來。同時「民報」中就開始了對梁啟超思想的正面進攻。於是在「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形成了一次綿亙三四年之久的大論戰。一九〇六年在上海曾有署名壁上客的人編輯雙方論戰之最初幾篇文章成一書，題目就叫「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

梁啓超之談民權，談革命，本只是爲了達到實行君主立憲的目的。現在滿清政府既已承認立憲，而革命派却當真地非實行民主革命不可，這時梁啓超不能不暴露出保皇改良主義的真面目，他是支持滿清而反對革命的。在這次論戰中，他一直寫到，「論中國萬不能引共和制之理由，」（見新民叢報七十五期）這樣的題目，他的失敗是註定了的。——粉碎了君主立憲派的迴避革命的幻想，正是革命派在這次思想論戰的重大成就。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通過這次論戰而站定了脚跟。他們把民主立憲的思想和反滿清的鬥爭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樣使得在進入鬥爭的羣衆面前有了值得爲之獻身的明確方針。推翻滿清後，必須也只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體，從此成爲公認的必然規律。孫中山在一九〇六年爲慶祝民報一週年而作的演講中說：「我們推倒滿清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政治革命的結果一定要建立民主立憲的政體。照現在的政治說起來，便是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我們定要以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的革命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少的。」

然而革命派在這次論爭中表現出的弱點也是很顯著的。梁啓超很能抓住這些弱點進行反攻，如果不是因爲他在

基本上已轉向反動立場，他的有些反攻是很能給對方以致命傷的。

革命派雖然以反專制主義和反滿相結合，但終究脫不出狹窄的排滿觀念，甚至發展爲大漢族主義思想。例如「民報」第二號中提倡以漢族爲主來「同化」國內其他各族。「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於他族可也。……今當就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當時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又絕不包含反帝國主義的內容。梁啓超以革命必召瓜分之說來責難革命派；革命派固然能辯嚴義正地指出，中國的危機並非產生於革命，而正是由反動專制統治者所招致，但他們自己又跌入帝國主義列強會尊重和扶持中國革命的幻想中。康梁改良派以爲，列強不喜歡中國人民「造反」，但如中國以和平方式行立憲而求富強，列強就會好意地扶持中國，而革命派却以爲，只要中國人民起來革命，列強就會一變過去優異態度，改頭相向。——在這點上，立憲派與革命派實際上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差，犯了同樣的錯誤。

民報第四期上提出民主革命思想的概括說明，其言曰：「吾之目的欲我民族的國民創立民權立憲政體（普通謂之民主立憲政體）者也，故非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不能達其目的。（各國革命有至君主立憲而止者，而我國今日爲異

族專制，故仍不能望君主立憲。唯有民權乃能革命，惟革命乃能民權立憲。」提出這樣的論調來推毀保皇改良主義，固然極有力，但其漏洞已可看出。照這樣說來，如果不是異族專制，「革命」也未嘗不可以「至君主立憲而止」了。這樣的思想正預兆辛亥革命的流產。

而且當時的革命派在民主思想上還有一最大弱點。他們不從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形勢出發來討論問題，却只是憧憬歐美各國的議會政治的形式，搬弄着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法理學」家的「理論」來做言論根據。他們既不懂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羣衆是農民大眾，也不懂得徹底的民主革命就是徹底的摧毀封建勢力。他們以爲問題不過在預先設計好一整套的民主立憲政府的制度，至於革命過程只是極簡單的事情。民報第四號上甚至說，只要提倡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民權主義）、曾國藩胡林翼這樣的人物也可以參加革命。「如此二主義而昌明也，則曾胡之在今日，吾可決其爲革命軍中之一人也。」則反對革命者只滿洲人與其死黨，不足以當一碎。然則革命之時日不必甚長，一方扶義，萬里響應，合謀分舉，指顧而定。」這種聊且快意的說法正反映了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軟弱，他們多麼盼望革命時期迅速過去，好很快產生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安定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大大論戰中還牽涉到社會主義。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把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舉其功於一役」的主張，幻想用他的「民生主義」來解決社會主義問題，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的發展。梁啟超在民族、民權問題上敗下陣來，便從社會革命問題上大肆反攻，詆爲「四不像的民主主義」（新民從報八十六號）。這種評語未嘗沒有道理，但是孫中山當時的三民主義在許多雜湊的內容中仍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即他敢於接觸土地問題。梁啟超之所以對其實並無社會主義內容的「社會革命」論大爲憤怒，甚至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即土地國有制）……與他種革命同時并行者，其入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就因爲革命派的這種言論，如果發展下去，見於實踐，勢必觸犯到地主階級的傳統封建利益。但是站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的革命派其實只能模糊地接觸一下這個問題，他們把最實際的反封建的問題理解成是預防資本主義社會衝突的「社會革命」問題，他們把十九世紀歐美資產階級的庸俗的社會改良政策抄襲來，以爲這就是社會主義，想把他揉和到民主革命中，以求「舉其功於一役」。其結果只不過是少數知識份子的空談，並不能領導起廣大人民來從事反封建的鬥爭。——當時這種對於政治改革與社會革命的混亂見解流傳下來，以致到現在還有人糾纏在這些糊塗概念中摸不清楚。

3, 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混亂

一九〇五——〇七的這個大論戰中，革命派取得了勝利，這給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準備。這準備是必要的，然而不是做得十分不夠的。在論戰中革命派所表現的嚴重弱點可以說明的爲什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在面對到革命風暴時立刻陷入軟弱無能的状态。革命是千千萬萬群眾起來的時候，革命領導者如沒有明確堅定的思想，就掌握不了革命的發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運動了辛亥革命，但當革命的到來時，他們的中心思想搖擺不定了。於是一切政治投機主義者，在思想上被打敗過的君主立憲派，爲帝國主義所使用的買辦商人，都擠進了革命隊伍，甚至分取得革命領導權。

「革命軍興，革命黨消」，——革命黨在組織上的分散也就表現了他在思想上的潰敗。

實踐考驗思想——辛亥革命証明了，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貧弱，解決不了中國問題，領導不了中國革命。

辛亥革命後六七年間，中國思想界形成一個最混亂黑暗時期。封建傳統思想仍儼然居於統治地位，君主立憲派的思想以各種化妝獻媚迎人，但找不到多少顧客，而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却黯淡下來了。歐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

級的各種思想被零亂地介紹到中國來，紛然雜陳，但沒有一種思想能夠集中地表現廣大人民的意願，能够組織起追求進步與解放的羣衆，能夠明確指明中國的前途和如何達到這前途的路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單純農民的空想的平均主義思想，都會在一定時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這樣的作用，但這種種思想都在急速發展的歷史舞台上被推向後面去了。如果不一個新的階級的新的思想挺立起來，担负起時代的任務，思想混亂無主的局面是結束不了的。這樣的的思想終於出現了，那就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自一九〇五年以後，社會主義的名稱就在中國漸漸地被人熟悉了，但在多少年間，在社會主義名義下販賣着的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直到一九一九年左右馬克思主義思想才正式被介紹到中國來，第一本被譯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就是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

馬克斯主義一到了中國，立刻和五四時期的羣衆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起來。中國革命展開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社會思想的發展也就在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下展開了一個新的時期。

一九四八，七，十二寫完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年

歷史的和理論的發展

杜德原著
劉思慕譯

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五一勞動節寫道：「共產黨宣言的歷史就是一八四八年以來近代勞動階級運動的歷史」。他續寫道：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四十二年前，在巴黎革命的前夜，當無產階級破題兒第一遭起來爲自己利益而鬥爭的時候，我們向世界提出這個口號，响應的沒有幾個人。到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西歐差不多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參加那值得光榮地紀念的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譯者）拂起手來。這一個國際只存在了九年。可是，這組織所造成的團結將歷萬世而永存，今天的國情更是空前未有的強固。的確，這由當前的情況就充分地表明出來。當我執筆的時候，歐美的無產階級正檢閱着他們的力量，他們第一次像同屬一支軍隊那樣動員起來，在一枝旗幟之下行進，爲一個當前的目的而鬥爭：我們正在目標的情景。使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都看明白，今天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真正聯合起來了。」

「怎得馬克斯活着跟我一道親眼看到這種情景呢

！」

那是五十二年前的事。今天我們可以檢視「宣言」發表以來一百年間的進展。那是多大的進展啊！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的饒有信心和正在上昇的資本主義了，而是淪爲獨占和帝國主義，染了不治之症，侷促于世界上日益縮窄的地盤之上。共產主義指導着四分之一的人類的政府，並建設着新社會，兩個最大的世界強國中，一個是資本主義強國，一個是共產主義強國。三十年來社會主義組織在地球六分一的土地上經過了考驗和鞏固起來，現正向共產主義邁進。歐亞兩洲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國；瀕死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部政治弄到只以愈益絕望地努力堵阻共產主義的高潮爲事；世界職工運動包羅了七千五百萬有組織的工人；五十五國的共產黨包羅了二千萬有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當我們進入了日益進展和深化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四個十年的時候，不再只是「西歐和美洲」，而且整個世界也在這運動中了。

「怎得馬克斯和恩格斯都活着，跟我們一道親眼看到這種情景呢！」

在這整整一世記之中，從頭到尾，「共產黨宣言」最先所闡明的原則，不只在整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中已經獲得理論上的証實（而一切其他的社會和政治理論已經被統百出和證明破產），而且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種運動正改變着世界——的推進，提供了實際的領導。

「宣言」發表之後卅五年，馬克斯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的德文本的序言上特別強調牠的「一般原則」：「大體上在今天仍然像過去一樣正確」：

「自宣言寫成後的二十五年當中，情況雖可能已有變更，但該文件所闡釋的一般原則大體上在今天仍然像過去一樣正確。」

十六年之後，在一八八八年英文本的序言上，恩格斯故意把一八七二年二人合撰的序言這一段話再刊出來。這樣子到了一八八八年：照恩格斯的判斷，經過了四十一年，宣言的「一般原則依然像過去一樣正確。」

一九一七年，列寧提出建議，一切馬克斯主義政黨都應復用共產黨的正確名稱，他寫道：

「我們應稱為共產黨——正如馬克斯和恩格斯之自稱為共產主義一樣。我們必須重申，我們是馬克斯主義者，我們拿共產黨宣言當作基礎，這個宣言已給社會民主黨歪曲和背叛了。」

這樣子，照列寧的判斷，在宣言發表之後七十年，「

我們拿共產黨宣言當作基礎——這即是說：不管一八四七至一九一七年間情況已有重大的變更，宣言的原則仍然有效。

在開頭我們就強調一百年來這種繼續不斷的思潮和共產黨宣言的「論旨」的有效性，是重要的。對宣言作這樣判斷的不只是學者學生和忠實的信徒，而是近代世界最能幹，最現實和最成功的實際革命家和政治領袖。這之所以重要還特別因為兩個理由。

第一，歪曲馬克斯主義的改良主義者痛恨共產黨宣言的明確堅定和不妥協的革命原則之深，正如每個戰鬥性的工人和有階級自覺的鬥士之酷愛牠們一樣，這些改良主義者仍然力圖散佈一種神話，說共產黨宣言是「青年期」馬克斯主義之早期的「未成熟」和粗淺的表現，牠已完全為馬克斯晚年的成熟的改良主義的智慧所代替而作廢了。例如斯巴爾哥(Spargo)在「馬克思傳」(通常被視為用英文寫的馬克思傳的標準)中寫道：

「馬克思事實上有好大成分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今天社會主義運動有兩翼之別，通稱為『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s)和『不可能主義者』(Impossibilists)，在兩者之中，前者遠較後者接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晚年的馬克思與一八四八年的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思想較為成熟，他的政治的智慧也到了爐

火燒青之候。以社會主義的實際政治的性質而言，如果牠要得馬克思最成熟的思想的認可的話，社會主義應符合馬克思後期的思想，而不是應符合共產黨宣言的青年期和未成熟的表现，睿智和實際政治家的手腕……與馬克思在青年時代所表現而後來識得予以鄙視的粗淺的激進主義構成極尖銳的對照。」

只要把這種譏諷與馬克思一生的著作和行動，尤其是後期的著作（如「法蘭西內戰」，「哥羅綱領批判」）對照五分鐘，牠就不攻自破，但這種譏諷仍然爲偽造馬克思的機會主義者所散播。因此，值得指出來的，不是馬恩二人在他們晚年對於共產黨宣言之明白再肯認，而且更有一點，即是，他們認爲在一八七二年的序言中必須對原則作一個補正，俾更明白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旨（補正的地方即是：「最重要的，巴黎公社給了我們一個教訓，使我們明白，工人階級不能單單掌握那現成的國家機構，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近代的馬克思主義代啓者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敵人，販賣那所謂「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嶄新」版的社會主義，力圖對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大加侮蔑，說牠是「陳腐」，「十九世紀中期」，「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學說，不能適用於現代二十世紀的情況。他們却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大膽的新發明」只是復

返于十九世紀初期馬克斯以前的社會主義，歐文（Robert Owen）的幼稚的社會主義，所謂永恆的道德真理（柯爾 Cole 在「戰後世界聰明人手冊」Intelligent man's Guide to the Post-War World 一書中就鄭重地指出這是社會主義信條的基礎），或復返于路易·布郎（Louis Blanc）的破舊的沒有人信任的社會民主主義，這種主義天真地相信經由普選獲得「和平的革命」，超階級的國家可作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

比起這種古舊和已被擊破的迷信的復活來，共產黨宣言的原則確是驚人的合時，並與現代的情況相接近。這當然不是說，自一八四八年以來，歷史站着不動，也不是說馬克斯主義站着不動。正如一八七二年序言所堅稱，「原則的實際的運用，不論是什麼地方，甚麼時候，都視當時存在的歷史情況而定。」活的馬克斯主義的任務就是依照新的情況和新的經驗來推行他的原則，而這就是列寧、斯大林和近代共產主義運動所實踐的任務，在今天，這種任務仍繼續被執行着。

共產黨宣言的原則，經歷了整整一百年，而仍繼續虎虎有生氣和有效驗，其秘密不獨在於牠們所指陳的社會發展見解——特別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和行將沒落的見解，以及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和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使命的見解——的永恆的歷史真理，而且在於如下的一個事實

，即是在工人階級運動還在幼稚階段，資本主義還正接近牠的頂點的當時，馬克思在宣言中以堅定的預先所定的中心任務，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仍然是今天的中心任務，並不因為現在資本主義瀕於死亡，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和經驗都有巨大的進展而有所不同。因此，共產黨宣言不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輝的體現，而且是這一百年來工人階級運動的實際的嚮導和老師，對我們今天的任務所提供的活力絲毫不減。

列寧于所著「馬克思學說的歷史的命運」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Doctrine of Karl Marx 一文中，把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的世界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 (一) 一八四八年革命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 (二) 自巴黎公社至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
- (三) 自俄國革命以來。

列寧是在一九一三年撰寫該文，他的緒論說：

「自馬克思主義創立以來，世界歷史三大時期的每一個都提供牠以新的證明和帶給牠以新的勝利。但未來的歷史時代却為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教義——貯備更大的勝利。」

這一個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的確，跟着帝國主義和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同來，自一九一七年起有着決定性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沒落的革命時代，已以上

昇的步調繼續到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世界經濟的危機和法西斯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目前世界兩個陣營對立的情況，都是這種歷史的發展陸續呈現的階段，這種發展，正如列寧所預告的那樣，已帶給馬克思主義以極大的日益擴展的勝利。我們可以照着列寧的區分，把這三個時代的發展和經驗簡單地檢討一下。

一、自一八四八年革命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關於這一個時期，列寧寫道：

「在第一個時期的開頭，馬克思的教義並不佔支配的地位，牠只是許多許多派別的一個或許許多思潮中的一股……」

「一八四八年革命對所有這些吵吵鬧鬧形形色色的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給以致命的打擊。在所有國家中這次革命顯出各社會階級是起作用……一切非階級的社會主義學說和非階級的政治都證明是純然的胡說八道。」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完成了這種發展……到了第一個時期（一八四八—七一年）——暴風雨和革命的時期——的末尾，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死亡了。獨立的無階級的政黨誕生了：這就是第一國際（一八四一—七二年）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那麼，這一個時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但不是英美美的勞工運動，後者仍然落後，並且站在社會主義的門外）奠定牠的領導地位的時期。

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共產主義出而問世，在牠的理論引線上已經是十分成長和成熟了。但是，的確，這種結果事實上是許久之前的理論和實際的發展之頂點。我們習慣向前一世紀回顧而把共產黨宣言當作是近代共產主義的起點。但是，如果牠是一個起點，牠也是整個前一時期的終結點。

在共產黨宣言以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以混亂和未成熟的形式存在着。在宣言發表五年前（一八四二），當時正編輯「萊因新聞」（*Rheinische Zeitung*）前還未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已經認識研究共產主義的必要，他寫道：

「我不懂得共產主義；但是，以保衛被壓迫者為目標的一種社會哲學是不能輕加非議的。我們必須把一種思潮研究透澈然後才敢去加以批評。」

恩格斯用下頭的話來論述共產黨宣言以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性質：

「在一八四七年，有兩種人是欣然願意被喚做社

會主義者的。首先是那些信奉各種烏托邦主義學說的

。這些人中之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歐文派（*Owenites*）和法國的傅利葉派（*Fourierists*）；其次，就是各種社會吹牛大家……這兩夥都是由勞工運動以外的人構成，他們希望在『有效養』的階級中獲得支持者。

「工人階級中有一部分人深信政治變革是不夠的，必須社會的結構也有澈底的變革，這一部分人以共產主義者自稱……」

「一八四七年，社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社會主義是很可尊敬的，至少在歐洲大陸是如此，而共產主義恰相反。

「既然即在那個日子我們已經完全相信『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任務』，兩個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中我們應該選用那一個，我們已毫不遲疑。我第一次選定之後，我們也從沒有予以放棄的意向。」

這樣子，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頭就認識了以下兩種傾向的存在：

（一）非工人階級的傾向，自稱為「社會主義的」。

（二）工人階級的傾向，自稱為「共產主義的」。

他們兩人毫不猶豫地與後一種傾向相結合。

在英國，「社會主義」是由歐文派人士所代表，這派

人士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和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但反對階級鬥爭和政治行動（歐文反對當時的「憲章運動」(Chartism)，指稱憲章黨人散播對富人的憎恨和敵視，以致阻礙社會主義王國的來臨，因為愛好公平的王國不能經由憎恨之門而達到）。而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則發展為憲章運動。「在要求憲章運動中，整個工人階級第一次政治政策運動（在要求憲章運動中，整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首先攻擊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恩格斯）」

「工人運動分爲兩派：憲章運動派和社會主義派。在理論上，憲章派是較落後，沒有後者那樣發展，但他們全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是他們的階級的代表。「社會主義派是透頂馴服與和平的，接受現行的社會制度，儘管牠是那般壞，除了爭取輿論之外，拒絕採用任何其他方法；他們確懂得甚麼工人怨恨資產階級，但他們認爲這種階級憎恨是沒有效果的。」（註一）」

馬克斯和恩格斯毫不猶豫地「憲章運動派——尤其是哈爾尼(Harney)和琼斯(Ernest Jones)所代表的該派左翼——密切地相結納，並替他們中央機關報「北方明星」(Northern Star)寫文章。馬克斯和恩格斯參加了：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倫敦示威，演說支持要求憲章運動。

恩格斯曾寫道：「馬克斯在英倫住了一些時，以誇稱自己爲憲章黨人（包括這個名字和牠的一切）自豪。」

馬克斯和恩格斯到了一八四四——五年便完成了他們的科學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正如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所指出，從那時起：

「共產主義已不再是代表一種儘可能接近于圓滿空幻地雕琢而成的社會理想。恰恰相反，共產主義今後是指無產階級所已加入的鬥爭的性質、情況和一般目的之理解。」

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的影响，以及由于他們的組織工作的結果，當時存在的共產主義派（他們本有公正協會Federation of the Just的組織）就于一八四七年夏天改組，成爲「共產主義聯盟」(The Communist League)，該聯盟的第二屆代表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

這樣子，宣言一開頭就是以一個有組織的黨的綱領底形式出現，這就是說，牠是「共產黨宣言」。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爲在宣言的第二節中有一項策略性的聲明說：「共產主義者並不另立一黨與其他工人階級的黨相對抗

（註一）引自恩格斯著「一八四四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情況」。

的。其後有人故意把這聲明的意義加以歪曲，其實這一段話的特殊意義是有關憲章運動，絕不與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階級自覺的政黨之中心任務相抵觸。馬克思主義關於這階級的立場一開頭就是毫不含糊的，恩格斯曾寫道（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特里哀 Trélat 的信）：

「爲使無產階級在有決定性的日子強大到足以制勝，牠成立自己的政黨，一個有階級自覺的階級政黨與其他一切的黨分開，並與他們相抗衡，是必要的。自一八四七年以來，馬克思和我都堅持這種意見。」但是建立這樣的大衆共產黨，基於馬克思主義來領導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使牠能夠奪取政權的路程是既艱且長的，牠需要幾十年間工人階級運動的長期和多種多樣的經驗，並包括與工人階級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傾向作劇烈鬥爭，而且這一路程在英國和許多國家仍有待于完成。

一八四八年，在開頭的時候，「响應的沒有幾個人」。緊接着宣言發表而發生的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革命強有力地證明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正確，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對他們的結果不能起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在各國，革命都顯出各社會階級在起作用。」源于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廣泛的發展，諸階級和黨派的新的關係——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民主革命與工人階級革命的關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革命的關係，社會民主主義

與共產主義的關係，第一次顯露出來。在法國，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之後跟着發生六月的流血——「六月暴動，歐洲內戰史上最偉大的事件」（馬克思），這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次獨立的戰鬥。緊接着六月巴黎工人被屠殺之後，就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的陸續崩潰，及採取拿破崙主義（Bonapartism）的形態的反革命的最後勝利。在英國，憲章運動已越過頂點而走向下坡，受了二月革命的榜樣的刺激，一八四八年最後一次的委擊，也以失敗和被鎮壓而終，在德奧，仗着工人的英勇而獲得的民主革命的初步勝利，却因資產階級的恥辱的無能和叛逆而前功盡棄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德奧資產階級，「爲皇室而犧牲了人民」，因而造成了德國的不幸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國家統一成功了，但不是像英法那樣經由民主的革命，而是循在大地主，軍閥和霍亨索倫王朝的共同支配之下的俾斯麥的路線。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歷史，除了寥寥幾章之外每一重要章節都帶有這個標題：革命的失敗！」但是，在這些失敗中倒下的不是革命。倒下來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附屬物，這是還沒有達到階級尖銳對立之點的社會關係的結果。所謂革命前的附屬物包含人物，幻想，意念，計劃等等，在二月革命以前的革命政黨沒有擺脫牠們的影響，足以使他們擺脫

他們的影響的不是二月的勝利，而只是一連串的反敗
。〔註一〕

最先從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領受教訓，并與革命的
浪漫主義階級的是馬克思主義，當時的革命的浪漫主義把
革命的失敗歸咎于一時的意外事件，而期待革命迅速的復
起。馬克思主義承認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和世界的資本主義仍然向上發展。一方
面，工人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勢力而出現，已到了足以使資
產階級驚駭，以致在危機發生之際，轉過來與反動勢力結
盟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以政治上的明確性和獨立的組織
而論，他們的進步又仍不夠，不能馬上有效地奪取政權
而挑戰。為達到這個目的，在仍然不可侮的資本主義的支
撐下，長時期的教育，準備和組織的工作是需要的。

「歷史已經證明我們和所有跟我們一樣想法的人
是錯誤的。從這明白出來，當時歐陸經濟發展的情況
還差很遠才成熟到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的地步。這
可由一八四八年以後席卷整個歐陸的經濟變革來證明
。這一個經濟變革確使到大工業第一次在法國、奧地
利、匈牙利和波蘭以至新近在俄國生了根，而同時使
德國積極成為第一流的工業強國！這一切都是建立在資
本主義基礎之上，因此一八四八年前的資本主義仍有很
大的擴展可能。」〔註二〕

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馬克思這種視野更擴展
至歐洲以外全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的向上發展去：

「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任務是世界市場的建立——
至少大體上是如此——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生產之建
立。世界既然是圓的，加爾福尼亞州和澳洲的移殖實
施，中國和日本開發以後，這個行程像是已經達到完
成。對於我們，目前的重大問題是這樣：在歐陸，革
命是迫在眉睫了，一開頭將採取社會主義的性質。但
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既然是在更廣大的地區內仍
然向上發展，這種革命是不是無可避免地將在這一小
地區內被粉碎呢？」〔註三〕

馬克思特別強調英國的作用和牠的世界獨占：

「英國這一個國家把全國人民轉變為無產階級；
牠以龐大的臂膀圍攪整個地球；牠曾經一度担任替歐
洲的反革命付錢；在該國內，階級對立已達到高度的
發展——英國像是革命的波濤消散沒沒所在的礁石，
牠把還在胎內的未來社會困死。英國支配着世界市場

〔註一〕引自馬克思：「法蘭西的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 in France"

〔註二〕引自恩格斯一八九五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所撰的序。

〔註三〕引自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的信。

。除非英國積極參加，歐陸任何國家或整個歐陸的經濟情況的革命，不過是一杯水內的風雨而已……

「除非英國資產階級，或英國的工業和商業霸權已經動搖，歐洲的社會革命的發動必不免於失敗；而舊英國只有在世界大戰中才能被推翻，只有世界戰爭才會給「憲章黨」(Chartist Party)——有組織的英國工黨——以起而反抗牠的強大壓迫者的成功可能性。」

(註一)

這種對未來的明若觀火的透視，預見到二十世紀的情況，那時一場世界大戰摧毀了英國的商業霸權，打開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牠的資本主義的支配和擴充還是不可侮的，憲章運動以後，牠的工人階級運動便由獨立的政治鬥爭淪為行會性職工運動和合作運動的有限度的形態，在政治上一般做了自由黨的尾巴。從這個自由黨——工黨政治時期演變為與資本家階級結盟的右翼工黨領導的傳統，這種領導不斷證明是工人階級運動前進的障礙，即在現在仍是如此。

不過，資本主義工業的擴展，必不能免地帶來了各國工人階級的擴展，在一八四八年之後——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之後——的時期的新情況中，馬克斯主義日益能夠影響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生長和情況

。一八六四年，第一個國際工人協會創立，總部設在倫敦，馬克斯當時在該會的領導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七二)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以準備對資本的革命的進攻，即是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基礎(列寧)。通過了第一國際，在與蒲魯東 Proudhon 的鬥徒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幻想和巴枯寧 Bakunin 的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階級的理論與實際中建立了領導地位。

近代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興起的這個形成期，是以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而達到頂點。那時，工人階級第一次在世界大都會裏舉旗政權達六週之久——自六月暴動以來，這是我們的黨的最光榮之舉(馬克思)。巴黎公社儘管有種種的弱點和未成熟的地方，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體現，而予以稱頌：

「新近，社會民主黨的鄉愿再次望見無產階級專政六個字而生畏。好的，紳士們。你們想知道專政是怎麼一回事嗎？看看巴黎公社好了。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註二)

(註一) 引自馬克思于一八四九年一月一日在「新萊因報」New Rheinische Zeitung 發表的「一八四九年

新年」一文。

(註二) 引自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為馬克思著「法蘭西的內戰」一書所撰的序文。

二，由巴黎公社到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

關於這一時期，列寧寫道：

「第二個時期與第一個時期不同的地方，在於牠的『和平』的性質，在於沒有革命發生。西歐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東歐的發展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實行這種革命。」

「西歐進入了『和平』的準備階段，準備未來轉變的時代。以無產階級為骨幹的社會主義政黨在各處成立起來；這些政黨懂得運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開辦他們自己的日報，他們的教育機構，他們的職工會和合作社。馬克思的學說獲得完全的勝利，并擴充其領域。」

「依照歷史的辯証法，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勝利迫使牠的敵人偽裝馬克思主義者。腐敗透頂的自由主義企圖在社會機會主義的形態下復活起來。他們把為偉大門爭準備力量的時期解釋為放棄鬥爭……他們在社會黨議員中，勞工運動的各職員中以及『同情』的知識分子中有不同的徒衆。」

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頭，資本主義達到了牠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的盡頭，而進入了獨佔和帝國主義的階段——即是衰退和腐爛的階段。

在外表上，看來還像是『繁榮』在無限地擴充，資本主義在擴張，殖民地帝國在開拓，『和平』的『黃金時代』——『只有』殖民地戰爭的時代——頗長。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培養了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幻想，這種幻想腐化了帝國主義國家勞工運動的一部份人，從而希望和平發展以及在資本主義下靠着分贖而改良生活狀況等等情態都可以繼續下去。

在事實上，這一個時期透露出更深的矛盾，帝國主義的對立的增長，英國世界獨占隨新資本主義強國的進展而崩潰；貿易鬥爭，關稅衝突和軍備競賽的強化，以及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這一個時期，工人階級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展起來的。

在英國，七十年代的長期蕭條和八十年代美德資本主義進展對於牠的地盤攪奪之顯而可見，已打破了十九世紀中葉以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為特色的資本主義的舒適和樂觀的腐鬼。經過了憲章運動以來的一個時期的『假睡』以後，工人階級重新醒覺，向資本主義挑戰。到了八十年代，社會主義在英國再發展起來，成立了一『社會民主聯盟』，儘管有種種的限制，這個組織還是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歸。新的職工運動與舊的行會限制絕緣，而擴展到不熟練的工人方面去。社會主義者與老的右翼的『自由工黨』領導權作長期和劇烈的鬥爭之後，到了九十年代，職工大

會 (Trade Union Congress) 已被爭取過來，支持產業國有的綱領，到了一八九九年，該大會決議，贊成以職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的聯盟為基礎，建立獨立的勞工代表組織，這導致一九〇〇年「勞工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的成立，其後改組為工黨。

在歐陸方面，大眾的社會民主黨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而在這期間發展起來。德國社會民主黨于一八七五年哥達統一會議中創立。法國社會黨則于一八七六年在居德 (Gendreau) 領導之下成立。社會民主黨在主要國家紛紛成立之後，國際組織重建的基礎也打下了，於是，第二國際便在一八八九年成立。

在一八七三年第一國際結束時，恩格斯寫道：

「我以為，在馬克思的著作有了多幾年的影響之後，第二個「國際」將簡直是共產黨的，並將明確地致力於我們的學說之傳播」。

這個希望的實現沒有像當時所想像的那樣快。第二國際宣佈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英工黨于一九〇八年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後才被許可加入），在組織力量上比第一國際有很大的進步，可是，牠的綱領沒有做到充分明確，機會主義的侵蝕越來越深，各會員國存門戶之見，事權不集中，在這方面，牠又比第一國際倒退。一直到一九一九年中，獲得了大戰和革命時代的淨化的經驗，恩格斯的共產

黨國際預言才實現了。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完成了一種偉大的積極任務，牠發展了大眾政黨，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以職工會、議會政治和日常鬥爭建立了立法的工人階級羣眾組織，而準備了為將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鬥爭。

但是，在這個和平合法發展的綿長的行程中，反映帝國主義影響的機會主義大大的侵蝕到舊第二國際的各社會民主黨中間去。馬克斯主義的革新的目的和原則只當作口頭禪來唸，但旨在改良的日常組織工作和日常鬥爭成為行動上的全部目的。用列寧的話（對英國獨立工黨的答覆一）來說：

「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綿長的行程中，這個初步鬥爭，這個組織鬥爭時期的目標被忘掉了，在大多數工人階級領袖以至相當多數的工人本身的心目中，這目的本身大抵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新」的理論（其實，只是舊的階級協調的自由主義理論）建立起來了，這些理論企圖否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的教義，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階級對立日益尖銳和工人生活情況日益惡化的學說，而倒宣稱，在「繁榮」的帝國主義和前進的大規模資本主義新時期中，危機在減少，階級的分立在緩和，工人的生活情況在不斷改善，繼續下去，其前途就是逐漸和平地演進為社會主義

，而不須經過階級鬥爭或革命衝突。

這種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攻擊，由英國的費邊主義者(Fabians)和右翼工黨領袖(如麥克唐納 Mac Donald)和獨立工黨)最明目張胆毫不掩飾地揭發出來。在歐陸方面，馬克思主義較為根深蒂固，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採取「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形態，即是說，企圖把反馬克思主義偽裝成在新情勢下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但是，牠們真實的內容却是一樣；而且為這一修正主義的攻勢作前驅的伯因斯坦(Bernstein)曾在費邊主義開山祖韋伯(Sidney Webb)門下受了修正主義的傳授。所有這些理論都表現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投降。

對於這些理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翼在舊第二國際內進行積極的鬥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是由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作領導。

早在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文中已經宣稱：「俄國已成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前鋒」。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塞維克黨——與孟塞維克主義(俄國形態的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截然分立的建立，構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的前鋒，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反機會主義的腐蝕而鬥爭。

二十世紀的風雲，如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第一次

世界大戰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把改良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關於帝國主義圓滑地演變為社會主義的義皇時代的幻想不留情地予以粉碎了。同時，布爾塞維克主義——即是二十世紀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却勝利地被證明正確了。

三、自俄國革命以來

列寧在一九一三年的著作中，認為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是以前的「和平」時期的終結和新的革命時期的開始之決定性的信號。

「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還沒有時間來完成他們對『社會和平』和在『民主政治』下風暴的不必要之讚頌，最大的世界風暴的新的源泉便在亞洲開闢了。俄國革命之後繼之以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我們現正活在這些風暴和牠們在歐洲的反響的時代當中……」

一八七二——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已經完全逝去，永不再回來了。」

這些話的真理是在一九一三年以後的年代得到強有力的證明，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列寧另一預言「未來的歷史時代為馬克思主義貯備更大的勝利」一語因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勝利而同樣強有力地得到證明了，這一革命構成了現代世界的決定性的起點。

因此，自一九〇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可以視為列寧所說的「未來的歷史時代」的序幕。發生於第一次近代帝國主義國家戰爭——日俄戰爭——之後的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確標誌着舊的「和平」時期的終結以及全世界新的力量的發動。牠的影響在亞洲同樣感覺到了。在亞洲，偉大的國民革命和解放鬥爭時期開始了。在英國，一九〇六年的大選使保守黨一敗塗地，自由黨則以空前未有的多數最後一次獲得政權，而工黨則破題兒第一次建立超議會的力量。當自由黨的帝國主義的措施引起幻想破滅的時候，工人階級又掀起澎湃的鬥爭浪潮，這表現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大罷工鬥爭，這樣的社會不安，在歐洲也同樣發生。在俄國，一九一二年——一四年的革命新浪潮，達到了高峯，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間聖彼得堡的街道上堆起障礙物來了，當時俄國的對德奧的宣戰才暫時把革命的進展中止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企圖以投身戰爭來躲避他們已無法控制的工人的革命高潮。但是這種逃避却證明是他們的沒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強國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和帝國主義經濟制度的矛盾之強烈的爆發。牠證明了帝國主義的破產，牠為工人階級所推測的日子已經到來了。可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在世界規模上完成這個任務。在大多數作戰的歐洲國家內，戰爭暴露了

第二國際的舊社會民主黨的破產，第二國際所通過的決議案本來看清楚了帝國主義戰爭之前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但這些決議案被背棄了；機會主義發展為社會極端愛國主義（Chauvinism）與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完全合為一體。這樣子，第二國際於一九一四年可恥地沒落了。但是，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的俄國布爾塞維克黨，與其他國家的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少數派聯合，繼續進行鬥爭，至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着手建立第三國際。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立即發生的暫時影響，是阻斷了工人階級革命高潮，分化了工人階級，暴露了舊型的社會民主黨的腐敗，以及便利了反工人的鎮壓的措施。但是，牠的長期影響加深了危機和擴大了革命的覺悟。新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者行動中表現出來了。到了戰爭的第三年，俄國二月革命把沙皇制度推翻了，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勝利，開闢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

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勝利在帝國主義環練中最弱的一環沙俄發生。那兒布爾塞維克黨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和組織，代表國際工人階級的最高的水準；只有這個國家是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領導工人階級。一九一九年，舊名詞「共產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承認的唯一名詞——再被採用，來標誌與那拋棄馬克思主義和出賣

工人階級的舊型社會民主主義的斷然談話。

一九一七年俄國工人階級勝利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牠的結束期和結束以後，強大的革命浪潮湧于全世界。這特別表現于一九一八年推翻凱撒主義的德國革命，奧匈帝制的崩潰，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亞洲的解放的革命鬥爭，英、法、美等國的動亂的醞釀，以及聯同俄國工人階級以抗帝國主義對俄干涉戰爭的國際團結。可是，在俄國以外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領導權仍然是在舊社會民主黨之手。只在革命浪潮中當中共產黨才建立起來。因此，工人階級在俄國以外的國家仍不能奪得政權。

這樣子，在一九一七年以後，世界發展而成爲兩部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的部分，舊秩序支配着的帝國主義部分（包括殖民地和中殖民地的大多數人類）。在俄國，列寧和斯太林的工人和他們的共產黨掌握政權，抵抗他們的敵人的一切攻擊，在大戰和內戰的驟關破壞以後熱烈進行重建的工作，藉着三次的五年計劃建立起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把老的落後的俄國轉變爲頭等的工業強國。在世界其他部份，給戰爭以及工人階級和殖民地人民日益強烈的抗戰所搖撼的資本主義，靠着社會民主黨的幫助，還能維持牠的支配權。自一九一七年以後，社會民主黨已經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絕緣，而投到反革命的陣營去

。美國的貸款，採取道威斯計劃的形式，靠着工黨政府的協助而實施，幫忙把西歐的資本主義恢復起來，重建德國的獨占資本的反動。社會民主黨許給工人一條到社會主義的和平與不易的道路，而不是內戰、流血、破滅、困苦、恐怖。他們認爲這種恐怖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的謬言落了空，資本主義的恢復和暫時的穩定只引起重新爆發的經濟危機、法西斯主義和戰爭。

在這些年間，各國年青的共產黨，以老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派爲基礎，要發展他們的政治和組織的力量，克服社會民主黨的弱點和宗派主義，建立領導的幹部和在羣衆中強固地生根。在這個形成期間，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中密切地聯繫着。第三國際擺脫了舊第二國際的弱點，復返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共產黨國際（一九一九—四三年）在全世界共產黨的發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訓練上面，完成了一種歷史的工作。這個任務已經完成。共產黨在各主要國家中已發展成爲全國性的羣衆政黨，領導國民的大多數，因而負有新的任務和責任，而各國的情況又各不相同，一個集權的國際組織形態已不再適用，共產黨國際因于一九四三年自行解散。在那時，全世界已發生着重大的變化。

第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的暫時和局部的穩定，并無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解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末年，

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奇蹟」，「危機的派除」，和「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等等的說教，雖使舊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幻想得到新的救命湯，但實際的結果却是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世界經濟危機。而對着這樣給與改良主義者幻想的摧毀性的打擊，資本主義轉而採用鎮壓和反動的方法，在極度嚴重的社會危機發生時，更轉而採用法西斯主義。在英國，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在一九三一年的經濟危機之前崩潰了，讓保守黨重握政權。在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有英美的大獨占資本家為後盾，于一九三三年獲得政權，進行恢復軍備和侵略的計劃。法西斯主義的廣泛的戰爭攻勢，由一九三一年日本在遠東的攻勢，發展為一九三五年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戰，一九三六年開始的德義對西班牙之戰，一九三九年的歐洲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的世界大戰。

但是，歷史的辯証法自法西斯主義的初步勝利和廣泛攻勢所產生的結果，却與牠的支持者所期待的大異其趣。法西斯主義的打擊，摧毀了合法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即主張工人用合法的與「和平」手段鬥爭的人——譯者)的幻想，擴展了工人階級各部分(包括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覺醒，因而在鬥爭中鍛鍊成新的團結，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也吸引到批瀾的反法西斯陣綫來。舊共產黨國際一九三五年的最末一次會議在準備這一廣闊陣

線上發揮領導的作用。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强大雖還不足以建立起西歐強國與蘇聯的同盟，以阻止戰爭，但西方強國拒絕這個同盟而支持協助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希望牠進攻蘇聯的罪惡政策即以慘敗而終。其結果倒引起法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之騷亂與征服，以及英國之極度危殆。這樣子，便發生了新的情況，當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候，英美與蘇聯的同盟能夠建立起來，這個同盟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勢力的摧毀成爲可能。在這次大戰中，蘇聯首當其衝，以重大的犧牲為代價，殲滅了納粹軍四分之三，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樣子，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在戰爭的試鍊中充分表現出來了。同時，納粹·法西斯對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的征服與佔領的情況，引起了廣泛的民族抗戰和解放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共產黨盡了領導的作用。

於是，第二次大戰的結果造成了新的世界情況，勢力均衡發生決定性的變更，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被削弱了，而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却增強了。德、義和日本三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垮台。只剩了兩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強國，那是美國和英國；而在兩國之中，英國是大大被削弱了，要依靠美國，後者在帝國主義世界中佔有壓倒和凌駕一切的地位，發動了制霸世界的新侵略攻勢。在他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雖受慘重的戰爭損失，但大大增強了牠在世界

的力量和影響，東歐一聯串的國家已掙脫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羈絆，而成為進步的人民共和國，向社會主義邁進；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洶湧前進，在印尼和越南建立了新的共和國，同時，民主的中國的力量也一日千里；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日益強大，世界職工會聯盟包羅了七千多萬的工人，在若干國家，共產黨的地位幾乎其他政黨之上。在英國，社會變革的醞釀反映於保守黨的選舉失敗以及工黨之以國會絕對大多數而重握政權，這個工黨政府在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領導之下，雖採取了反動的帝國主義政策，但所造成的危機只更赤裸地暴露舊政策的破產。

而對着工人階級，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和殖民地解放的進展，帝國主義在美國的率領之下，以英法兩國政府為主要幫兇和衛星，展開日益橫暴的侵略攻勢，公開地對共產主義和蘇聯進攻，但實際上也同樣以民主政治和一切民族的獨立為對象，牠復活了法西斯的戰爭煽動的口號，走上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路。於是，如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蘭集會的，歐洲九國共產黨的宣言所描述的那樣，世界兩大陣營的新的分野出現了，一邊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陣營，另一邊是民主陣營。像百年前那樣，反共產主義十字軍又變成舊社會的一切政客的戰爭喊吶，杜魯門和羅馬教皇，蔣介石和戴高樂，艾德禮和勃萊德，摩斯來和舒馬赫都美

口同聲這樣的叫聲。但是，這時世界的勢力均衡已經大變了。新社會的勝利日益在望了。

這樣子，自「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一百年的世界歷史已經把世界階級力量在未來人類社會的鬥爭中的對立帶到極高峯，而這個未來社會的輪廓已經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先知者的預見描劃出來了。一百年前巴黎工人階級六月暴動開其端的角鬥，現已接近頂點了。垂死的舊社會反共的瘋狂的戰爭叫聲響徹于世界各個角落。但是，歷史的定調是無可逃的。「共產黨宣言」所預斷的資本主義的沒落，最後人類解放的目的，宣言所描繪的未來自由社會，以及「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就是全體自由發展的條件之社會結合」，已接近實現了。艱巨的戰鬥仍然在前面。敵人還沒有死掉。但是，這一百年來的紀錄，既已強有力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正確和牠的實踐之勝利，自能够使我們對未來抱毫不動搖的新的信心。

青年自學叢書 陳原著

世界政治地理講話

本書就戰後世界政治地理上所發生的變化，作了初步的檢閱。書末附朱育選先生掉圖四幀，尤足參考。

生活書店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

英國·希爾 (G. Hill) 作
沈 方 譯

馬克思主義的締造者們，從沒有把自己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作有系統的闡述。他們相信並做到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以寫作歷史來傳播自己的史學理論，而並不寫作歷史應該如何寫法的文章來傳播自己的史學理論。因此，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看法，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就要比看註釋家和批評家們的一切文章獲益大得多。應用在歷史方面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分析的技術，觀察的方法，而不是教條；由於這樣，要加以簡單的綜述而沒有一點點歪曲，是很困難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真正考驗之處，是在行動中，在寫作歷史或創造歷史之中。

在這篇文章內，我打算很簡單地（因此不得不是很粗疏地）綜述一下我所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之中主要的東西，然後再敘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的影響，再提出若干方向，在這些方向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了解，將會有助於目前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學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論者。他們肯定了庸俗哲學家們所一直否認的事情——物質世界是存在的，我們的意識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物。他們說，決定社會的結構的，是人類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是財富之生產和分配的方法。（人類學家大多數同意這一點，至少認為這理論適用於原始社會；奧溫 (Owen) 在其精采的著作『徭田制』一書中，說明了大鐵犁的使用方法及所有權，如何決定了徭田制和中世紀封建領地的整個制度。

在生產手段增加的時候，創造財富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和天然資源漸成爲若干順利的個人的私產；這些個人。由於保衛自己，反對沒有產業的人們，漸漸團結成爲一個剝削別人的階級，站在人群大眾的頭上，而且剝削他們。這個階級使用著力量（政治行動、國家）及宣傳和說服（宗教及一切意識形態）來維持自己的利益。所以，用「共產黨宣言」的响亮的話來說，則是「迄今存在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由此可見，一個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最後決定於該社會發展的經濟的階段。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集團和天主教的僧侶統治制度，都是站在被剝削的農民的

背脊骨上的東西：只有在社會中的基本敵對性再不存在於地主和農奴之間，而存在於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之間的時候，它們才被君主立憲制或議會共和制所代替，才被以新教或理性為形式的個人主義所代替。因此，在研究任何特定時代之際，歷史家們應首先看一看生產中的主要關係。馬克思主義者們通常劃出五個主要類型：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和社會主義制。有些人加上一個『亞細亞生產方法』，作為有別於歐洲古時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的一種類型。

可是，雖然社會的經濟發展最後決定着它的政治上層建築和它的意識形態，『最後』二字需要特別著重。經濟的變化並不自動地反映為政治變化，一個特定社會也不會全體的人同時改變自己的思想方法。經濟關係的變化對人發生影響；有的人開始用新的方法來思想，開始批評舊的制度和舊的思想方式。有時候這種批評發生了效力，使社會有一些轉變，適應了已經轉變了的經濟情況的要求。但當有產階級的緊要利益遭受危險的時候，這種轉變不是和平地發生的。革命形勢的能否利用，以及革命的久暫和痛苦的程度，要看被剝削的民眾明瞭政治轉變的必要到達何種程度而定：這一點，又有賴於已經充份自覺到政治轉變之必要的人們的活動。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如果封建主義並未衰頹，而資本主義尙無起而代之的準備，那麼，

十八世紀的法國就不會有革命思想；但是那些革命思想的有效程度，就要看它的明確性如何，要看其散播在法國民眾中到達何種程度。

這一點是如此重要，如此地被愚昧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所曲解，以致這裏必須費一些篇幅來摘引恩格斯的話：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的決定因素，最後地是現實生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也好，我也好，都沒有肯定比這更多的東西。因此，如果有人歪曲這一點，而說經濟因素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他就把這一點弄成毫無意義的、抽象的和荒謬的詞句了。經濟情況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後果，勝利的階級在作戰成功後的政體及法制等，法律的形式，以及甚至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戰鬥者們的腦子裏的反映物：政治，立法和哲學的理論，宗教思想，以及其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各種教條的體系——也影响着歷史的鬥爭的過程，而且在許多場合中對這些鬥爭的形式起決定作用。所有這些因素起着相互作用，在這中間，在一切無數的偶然事件（即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和離于證明，而使我們認為其內部聯繫不存在及可以忽視的事物和事件）的本體之中，經濟的作用最後證明是必需的。要不然的話，這理論隨便應用到歷史的任何時期，會比解答一個簡單

的一次方程式還容易。」(註)

像這樣，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思想意識對歷史的影響。因為他斷定這些思想意識有着終極的經濟根源。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古典學說的復活，新教徒改革家恢宏早期基督教會的訓條，具有非常巨大的歷史意義。馬克思主義者決不否認這一點，雖然他指出，由于這兩個時代經濟狀況的類似，人們曾在那些思想中找到他們自己那時代的問題的答案，而且早期的新教徒根據自己的偏好，只強調原始教會的傳統精神中適合於自己的那一部份。同樣地，十八世紀法國的革命家們，曾把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輸入法國；而在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工人運動曾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從取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意識的西方接收過來，俄國工人階級通過經濟和政治鬥爭摸索道路，终于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方面成熟起來，在他們自己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國家內完成了革命。

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否認思想意識萬能，不把巧妙或善良的思想孤立起來看。牛頓之所以發現地心引力定律，並不由于一只蘋果跌在他的頭上而忽然頓悟；這個發現的根源，是他的時代的經濟需要。溫斯丹萊(G. W. Instanley)和巴布夫(Babouin)曾先後于一六四九和一七九六年想出了最有名的共產主義的理論；但是因為十七世紀的英國或十八世紀的法國並沒有發展了的工人階級運動，

這些思想無法實現。因此，重要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反映並適應於真正的歷史力量的和階級需要的思想。詞句必須變成血肉，理論必須由人來轉變成為實踐；而歷史衡量人，是衡量其所做的事，並不是衡量其所說或所相信的事。英國後世的人們看起來，目前的政府並無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事實上把英國導入經濟災難，喪失國家的獨立性，縱然政府中每一個人主觀上都熱烈堅信社會主義，也大約是抵不了事的。

三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後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學的影響，要比對於其他任何部門知識的影響都來得顯著。我們可以列舉六個主要方面，在這些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曾在過去一百年間直接或間接地轉變了歷史學的研究：

(一) 在這一百年內，經濟史的決定的重要性之被人認識，是最顯著的事情。目前所有的歷史學家對於過去時代的看法，和一百年前歷史學家們的看法顯有不同。現在的歷史學家們承認，一個社會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方法

(註) 馬恩通信選集，第四七五頁，恩格斯至布洛基函，一八九〇年九月廿一日。參閱「反杜林論」第三〇〇頁及「費爾巴黑論」第五八一—六〇頁。

，一定影響該社會的結構和生活的所有各方面。這是歷史走向科學化的最顯著的進步：推溯根源，這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來的。

(二)重要性僅次于這一個大變化的，是人們日益承認經濟上各階級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史學協會』兩年以前發表的一本小冊子「法國革命的原因」，生動地証實了這一點。該書的作者概述許多歷史學家對於法國革命的見解，自布克(Burke)起至馬蒂(Mathiez)止，個人的善惡智愚的說法起至社會階級的說法止。這小冊子並未提到馬克思的名字，可是無疑地，馬克思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如果你『不相信階級鬥爭』，你就至少無法寫一本認真的十九世紀史。由於這樣，舊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解釋簡直是胡言亂語，雖然英國人折衷主義的天才，還能使卓越的歷史學家如屈佛倫(Tovey)教授之類把一小點點經濟史裝嵌在傳統的政治史上面。但是十九世紀太像二十世紀了，偉大的領袖們『感化』一個民族之類的說法無論如何講不通；在我們能夠檢查的事實之前，舊的歷史學家們的神話粉碎了。然而舊的神話依然作為強有力的傳統而存在着。當代的所謂史學家如伯脫菲爾德(Batfield)教授之流，爲了有意識的政治上的目的，也還在宣揚古舊的神話，這位教授當看到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出路的時候，

就懊悔自己年輕時候攻擊上幾輩的歷史學家了。(註)

(三)過去一百年來，歷史學家們已經漸漸認識了人類思想的社會根據，意識形態的社會根源。他們已不再從表面上來確定他們所寫的人物的性質。湯尼(R. H. Tawney)的『宗教與資本主義之興起』一書是實踐此種新方法的一個例子；曼海姆(K. Mannheim)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則企圖不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在理論上闡述這一點；但這兩個作家，顯而易見都曾直接或間接地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人稱馬克思爲『現代社會學之父』，那是一點也不錯的。

(四)歷史家們的觀點，和上述的變化同時，還有一種新的相對論。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大家們把自己認爲是絕對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歷史，雖然那些道德標準事實上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產物。現代的歷史學家們大部份認識道德標準是隨社會的改變而改變的。有的人絕望地放棄了保留任何道德標準的企圖。牛津大學的現代史主座教授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說，『十九世紀人士的種種假設，今天看起來是成問題的，其所舉的『事實』，也是至少同樣地成問題的。』他又說：

(註)請參閱該教授所作『舊歷史家對歷史的著法』和『英國人和英國史』二書。

「歷史家們無論如何應該了解，以他們放棄舊式的論點而言，他們破壞十九世紀史的基礎的工作較多，而革新十九世紀史的工作較少。如果把基礎也否定了，那麼用事變的新哲學來代替舊的假設的工作，就得留給下一代人來做了。」（註）

馬克思主義者也許大部份會同意這樣的話的。在這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所生的消極影響，一向要比積極影響大得多——例如英國社會就是這樣的，英國的經濟已停止擴展，英國的傳統觀念甚至已不能鼓舞英國自己的思想家。

（五）過去一百年來，寫作歷史的資料方面有了一個革命。以前所用的資料，主要是文學性的——編年史，回憶錄，書札，日記，報章；現在所用的資料，主要是文件性的——公家紀錄，教會登記冊，法令，碑文等，甚至是考古學性質的——舊時真正的工具，機械，建築物和田畝。要把這種轉變直接歸之於馬克思的影響，似乎是不對的，但這種轉變直接歸之於馬克思的影響，似乎是不對的，但這種轉變確乎符合於馬克思的歷史觀；而在他自己的著作里（特別是資本論），馬克思以驚人的效力引用了鑒皮書和其他文件。至於他是否和目前的對「文件」的偶像崇拜有什麼相同之處，那是另一問題：馬克思對於官方文件，不管其已被時間和塵埃弄得神怪化了的文件，總保持相當的懷疑態度。馬克思摘引但丁，莎士比亞和哥德的文

章以說明「資本論」中的論點，他在自己最精彩的歷史著作中的警備和創造性的文體，使他和現代的「科學的」歷史家們截然不同，那些歷史家的著作，寫的時候顯然是並不打算給人看的。

（六）最後，由於馬克思確立了經濟事實具有最後的決定性，確立了人類的一切政治和文化活動最後是和經濟有關係的，現代對歷史的完整性的見解，也得溯源於馬克思。目前歷史教科書中依然把「文學」，「藝術」，「宗教」等教章黏附在政治的敘述之後，好幾尾巴掛在驢子的屁股後面一樣。可是良好的現代歷史家們會承認，人類活動的種種表現是一個整體。舉個例，一部十九世紀俄國史，就必須把知識份子的文學和農民的藝術告訴我們，也必須把階級鬥爭有時從中產生的宗教和民族形式告訴我們，同時，也得告訴我們沙皇在一八八一年說過怎樣的話。但如果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個整體，歷史家本身對於社會和社會歷程，就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看法：他必須有一種哲學。不論他是否採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要他是一個良好的歷史家，他就會越來越感覺到對於人類活動中相互關係和相互起作用的無數的事實，有解釋的需要，而馬克思主義是加以解釋的。甚至在較次要的實際事物中，歷史家們也

（註）見「歷史」雜誌第三十卷一一二期

會同樣地感到有完整的哲學的需要。如果歷史家們不把自已整個時間完全化費在鑽研微小而不重要的細節方面，那麼，他們所必須處理的一大堆資料，就會使他們覺得研究工作者有更大的合作的需要。雖然，一樁合作的工作要是沒有共同的觀點和目標來加以結合和貫通，儘管其中某些組成部份如何值得讚美，還是不能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劍橋現代史」就是一個例子。

四

但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它是節過資產階級的學究式歷史學家的腦筋而發生作用，那些歷史學家揀出了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把其他方面擱開。費邊主義者們有意識地和故意地撇開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成份，同時採納它的許多技術。他們就用這樣的做法，把使得馬克思主義具有生命的東西——辯証法，階級鬥爭，對社會整個生活的分析——置之不理。『我們現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了』，那意思就是說，我們認識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可是，有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包括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如蘇聯的歷史家波克羅夫斯基（P. K. Toksky）等人，以及若干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一直把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等同起來——枯燥地記錄經濟變化，說是經濟變化不可避免地一定產生政治變化。其中最極

端的例子，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份「經濟史學報」所載文登瓦克（P. C. Gordon-Walker）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該文中堅持說『宗教改革是一種運動，編年史上可分兩個階段，和物價革命的兩個階段相符合。』據他說，路德新教主義是德國銀子生產擴張和一二〇至一五〇〇年間南美開始輸入歐洲的結果，而卡爾文主義則是由于波多西和美洲其他銀鑛之發現所造成的。這真是『簡單的一次方程式』！

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就寫道：

『年輕的作家們有時強調經濟的一面過了份，這一事實，是馬克思和我自己該受責備的。我們在反對不承認這一主要原則的論敵時，會不得不強調這一點；我們並不常常有時間，篇幅或機會來恰如其分地包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因素。』（註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主張『人類自己製造着歷史』，馬克思更加上說『人類社會的歷史決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他們的個別發展的歷史，不論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那發展。』（註二）

今天許多歷史著作的錯處，與其說在於忽視經濟，不

（註一）見馬恩通信選集第四七七頁，恩格斯致布洛克函。

（註二）同上第七頁馬克思致安柯夫函。

如說在于缺乏詩意，而十九世紀史家甚至如麥考萊(Macaulay)和弗羅德(Froude)，也是具有詩意的。湯尼教授最近說：『目下歷史家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文件，而是更堅固的靴。』他們這樣地着魔于經濟力量，這樣深陷在繁瑣的細節的網羅里，這樣地被乾燥得像灰塵一樣的文件所壓倒，以致無法看到活着製造了歷史的真正的人：他們既不描繪森林的偉大，也不描繪林中各樹獨特的個性。如果這樣做的话，我們就會像費歇(H. A. I. Fisher)那樣，在歷史中除了『偶然和無法預見的玩意兒』之外，什麼都看不到了。但是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頭腦的歷史家，就會在研究中具有綜合歷史各方面的願望，就能在表面上最枯燥的紀錄中，摘記當時的人的痛苦和希望的證據。

我們正在接近一個舊的辯論，就是歷史究竟是一種科學呢，還是一種藝術。史家如屈佛來(G. M. Trevelyan)等人覺得詩人布萊克『力量是永遠的歡喜』一句中包含的詩的真理，要比長期而經濟決定着政治科學的真理更重要。馬克思對歷史的解釋是科學的，但『一切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命題，當然是活着的各個人類的生存問題』；(註一)生產力是……人類實際能力的結果』(註二)。歷史是說述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說述各人之間的關係的東西。歷史中有詩意的瞬間，個人偉大的舉動，對於科學的歷史家說來，其真實性並不比統計表格差。面對着整個日耳曼

封建國家大會的力量，路德宣佈道，『我的立場就是這樣，幫助我吧，上帝，我不能做別的事。』當火燄燃着身體的時候，拉的曼對力特萊說，『我們今天點亮這樣一支燭，上帝保佑，我相信在英國，這是永不會熄滅的。』當宗教裁判官強迫伽利略否認他用望遠鏡證明的地球繞日而行的理論時，伽利略喃喃道：『不過，它(指地球)確乎是動的。』在德國法庭之上，季米特洛夫從國會縱火案的被告轉為原告，控訴了德國納粹政府，並且預言了它的沒落。在這些時刻，可以說，歷史是沉澱在個人里面了。

如果解釋過去事件不能有兩個基本上無法調和的學派，如果『偉人』論變得越來越不合科學，而『無人格的經濟力量』論變得越來越機械，如果也不能變成單純的折衷主義如『一個事變接着一個事變，如後浪推着前浪』(費歇語)，那麼，我們就必須解決個人與社會歷程之間的關係問題，解決自由與必然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五

作為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輕浮的自由主義的反對行動，現代有許多哲學家和歷史家們已重新陷入陰森

(註一)「德國意識形態」，第七頁。

(註二)馬恩通訊選集，第七頁，馬克思致安能柯夫函。

的悲觀主義。他們覺得：人類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在逐漸退步。人對於自然增加了控制力，就產生原子彈和假文明。相信人的能力的人道主義，是懶惰的自我欺騙。絕望是合理的。自殺之外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帝。

假如從一個角度看，這是一部份真的。但這不是新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盧騷那里接收了人類道德的衰落伴隨着文明的興起這概念。恩格斯覺得歷史是『差不多和最殘酷的女神一樣地殘酷』的：人類的故事就是原始社會中人類所享有的權利和平等消亡的故事。但是，這一點雖然重要，只不過是歷史的變重過程的一個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了平等權的喪失，其代價為經濟上的進步，這樣使盧騷的直覺有了新的意義。社會中大多數人喪失了對生產的控制權，控制權落在擁有特權的少數人手中，就產生了一種虛偽的藉口。說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和整個社會的利益一樣的。(註一)馬克思已經科學地說明了歷史過程如何必定會終於使人類重新獲得無階級社會中的權利。這樣的沒有階級的社會，將以非常之高的技術為基礎，而技術發展到這樣程度，只有在私有財產制之興起融解了原始共產主義，經過許多多世紀的階級統治和人類的痛苦之後，才有可能。損失和收穫是同一過程的兩方面：光明是醜惡的，醜惡是光明的。

對於整個文明的歷史的這種深刻的看法，包含着令人

安慰的東西，但和十九世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樂觀主義，絕少相同之處。歷史是一個悲劇，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悲劇。我們不僅是看客；我們也在行動之中有份。原子能本身既不好，也不壞；它對人類的影響，要看它被用在什麼地方，而這又要看社會的組織是怎樣的。社會的組織，又有賴於你，我和千百萬其他的人的政治鬥爭。我們的十九世紀祖先們受到過度的樂觀主義的欺騙，接受了極度縱容人類自私心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們現在面對着資本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後果，而放棄了希望，我們也就無法為了走向自由平等的社會而鬥爭。本楊 (Bryan) 的「神經戰爭」里的一個角色說道：『因此我們不敢絕望』(註二)

六

古語說得好，善與惡都發源於一個人的呱呱墮地，這中間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使我們平衡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幫忙現代的歷史學家們在社會諸力量 and 使得社會力量起作用的人類之間，在統計數字和詩之間，在必然和自由之間維持一種均衡感。

(註一) 恩格斯：「家族的起源」第二〇三—四頁。

(註二) 這一節請參看多爾 (D. Dora) 在「共產主義雜論」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的一篇文章。

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積聚了足夠的事實材料之後，就能夠區別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中進行變革的因素和阻滯變革的因素，區別『進步的』社會和『反動的』社會；在『進步的』社會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是和社會的經濟結構和諧，並且允許其向前發展的，在『反動的』社會中，守舊的統治階級竭力抑制經濟的進展，用政治力量 and 思想意識上的欺騙來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在這個基礎之上，歷史家能夠科學化地評價一個特定社會中的互相衝突的諸力量的地位。這並不是把莎士比亞歸入『進步』類或『反動』類的問題，因為，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莎士比亞並未有意識地和他的同時代的對敵力量聯繫起來；就他作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點而言，他反映了鬥爭雙方的一些東西。但是，在歷史的大衝突中，歷史家確是偏向着一邊的，歷史家用許多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對象。十七世紀初英國內戰中，許多誠懇的父親們和善良的丈夫們站在查理一世方面作戰；可是他們如果勝利的話，就會使經濟停滯，引起政治上的壓迫，引起出版物的檢查，而使大詩人密爾頓和本楊默不作聲。無疑地，在一八七〇至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確有一些罪犯混在革命中『搗亂』，但這一點不能更動歷史家的判斷；他們的事業基本上是合乎正義的。在這樁事變中，失敗並不是歷史最後的斷語，今天法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就是證據。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者既不相信歷史由偉人造成，也不相信經濟變化能自動產生政治成果。思想是由人們的環境決定而深印入人們的腦中的。各社會集團醞釀地尋求自己的地位的需求，只感覺到自己的鞋子的緊窄之苦。而『偉人』，即政治或知識方面的領袖，就在危機的時刻明白白地提出了它們的說不清楚的感覺。要是沒有列寧，俄國革命無疑地還是會發生的，不過革命的過程會很有不同。人類的心智是引起變革的因素之一。

恩格斯總結道：

『人類自己製造着歷史，但迄今爲止，尙未能以集體的意志，或按照集體的計劃，或在一個明確規定了的。特定的社會中製造歷史。他們的努力互相衝突，正由於這緣故，所有這種種社會是由必然性來轄治的，而偶然性事件，則爲必然性的補充物和必然性出現的方式。在這里，表現于種種偶然性上面的必然性，最後地仍是經濟的必然性。值得我們研究的所謂偉人，就是從這必然性上面產生的。在一個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國家內產生這樣那樣的一個人，而且恰恰產生那個人，這自然完全是偶然的事情。但如果把他除掉，就會有一個代替者的需要產生，這代替者是一定會找得到的，不管好壞，但他斷根是一定找得到的。當法蘭西共和國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正需要一個

軍事獨裁者的時候，恰恰那個科西嘉人拿破侖來作這個軍事獨裁者，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可是如果沒有拿破侖，另一個人也會起而代之；因為某種人已經成為必要，他總是找得到的：如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在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時候，帝里（Thierry），米奈（Mignet），吉佐（Gизо）和一八五〇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家本身都是實証，證明唯物史觀是當時急迫需要的東西；而摩根（Morgan）發現了同樣的概念，這一事實証明了時機已經成熟，唯物史觀已經不得不被發現了。（註）

七

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科學化的歷史學的創造，有非常巨大的貢獻。但是放在學究們的手里，這種科學化的歷史就變成枯燥、乾燥和宿命主義的了。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雖然是徹底科學化的——實在要比經濟決定論者科學化得多——却能够保存歷史中的詩的成份，保持歷史家的樹立德德價值的標準之權；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科學化分析階級鬥爭，把它作為歷史的動力，同時也看到個人和這鬥爭，把它作為歷史的動力，同時也看到個人者這鬥爭的關係。個人的自由從屬於對必然性的承認以及對歷史過程的有意識的合作，而歷史的行進，只有假

乎於個別的男人和女人。詩人密爾頓曾在這個意識上了解自由，雖然他說起上帝和天國，而不談歷史過程；他說甚至不公平的王們也得由上帝來處罰，但上帝仍然沒有理由不用人民來作自己的工具，他說這話的時候，是為了自己同輩的人而最後把論點反對消極的宿命主義。人民，社會各階級，是工具，社會變化是通過這些工具而發生的；而人民只有確信了行動的必要時候，才會行動起來。卡爾·馬克思一方面已經說明了革命是歷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在貧困之中一生盡瘁于組織革命鬥爭，這種傳為佳話的所謂「自相矛盾」，只要我們明白馬克思不是一個宿命論者，就可以了解實在並沒有什麼矛盾。

人類的歷史，是道德判斷自由的增進史。密爾頓要比他同時代的人們更自由，在道義上更負責，正因為他對於歷史的轉變具有清晰的觀念，了解到自己必須為這轉變而作戰，縱然他還是以神秘的語句寫述自己，認為自己執行着上帝的意志。今天，馬克馬主義者比密爾頓更自由了，

（註）馬恩通訊選集，第五一七一—一八頁，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致斯塔根堡函。恩格斯在此函中加了一句警告：「請不要把我上述的話的每一個字太仔細地衡量，而只把這個關連之點放在心里；遺憾的是我沒有時間把我寫給你的話，寫成足以付印的文章」



史事與人物

吳晗著

吳晗先生的文章素以精博著稱。這本書是他最近的一個結集。全書分四輯，第一輯是歷史的翻案文字，可說是「歷史的鏡子」的模範；第二輯記人物，深刻異常；第三輯全係書評；第四輯選鄉散記三篇，生動有趣。全書計一十八篇，篇篇可讀，至文筆之精到，猶其餘事。

生活書店
發行

因為馬克思主義偏于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係的理論，由于消除了上帝，已經泯除了一個武斷因素和若干不可避免的教條的壓力。正因為如此，對於阻礙着充份的自由的是什麼東西一節，今天馬克思主義者要比密爾頓看得更清楚。他對歷史的研究，幫助他學會如何使社會和他自己更自由。「過去」並不只是一張用來在消極的觀察面前開映的影片；「過去」是一個實驗室，在這中間，實驗在進行着，理論被考驗着，科學知識在積聚着。我們研究「過去」，是爲了使我們自己更適合於行動。

「人類自己製造着歷史，」恩格斯在上面所引的信里這樣寫，「但迄今爲止，尙未能以集體的意志，或按照集體的計劃來製造歷史……他們的努力互相衝突，正由於這緣故，所有這種社會是由必然性來轄治的。」下一步

，就是要使階級鬥爭結束，以去除各種努力之間的衝突，而階級鬥爭的歷史，據「共產黨宣言」所宣佈，就是「迄今存在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階級鬥爭結束之後，在沒有分裂的人類能夠合理地計劃自己生活的方法的時候，必然性王國通到自由王國的道路才能敞開。「人類總是把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放在自己身上；因爲，把事情仔細一點看一看，我們總會發現，只有在解決任務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的時候，或至少正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任務本身才會產生。」（詩）

（譯自英國「現代季刊」）

（註）馬克思選集，第三五七頁，「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

英康福特 (M. Cornforth) 著
馬 特 譯

一 馬克思主義與過去哲學成果的關係

作為一種新的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在一些基本點上是不同於一切以前的哲學的。但在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念却是從以前的哲學所達到的立腳點上出發的。像一切新的東西一樣，馬克思主義是從先行的條件產生出來的。它同化了馬克思以前的哲學的進步觀念，而在同時却又批判了和克服了它們的局限性。

在馬克思以前的哲學中，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與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有着密切的關係，他方面又與康德以後德國唯心論最高發展階段的黑格爾的辯證法有着密切的關係。

法國唯物論者——何爾巴哈 (Holbach)、黑爾維修 (Helvétius)、和百科全書派——繼承了科學經驗論的偉大的傳統。他們的觀點，是被培根所提出，被洛克有系統地所發展，並在一切自然科學的進步中所涵蓋的觀點：真正的知識必須立腳於經驗之上並能够用實際來證實。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這個觀點墮落為巴克萊和休謨的主觀唯心論：它主張知識必須局限於休謨所說的人們自己的感情材料的「狹窄範圍」之內。法國唯物論者却與此相

反，他們與此人類知識範圍的局限性的說教無關，他們斷言，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科學知識的發展有無限的可能性。而在他們的手上，經驗論的學說曾經發展為唯物論的批判論之強而有力的武器，以反對哲學家和神學家的獨斷，和反對法國革命前的政治的制度。

馬克思主義分有和更清楚而有力地重新確定前人們曾經表現過的唯物論的見解。這樣，馬克思主義主張：「思想和意識……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身却是自然的產物。」它主張知識必須立腳於經驗之上，因為真正的觀念「只能從外在世界決不能從思想自身所創造和派生」。它主張我們的觀念是能夠正確地反映外在世界，因為「人類頭腦的產物，最後分析起來，同樣是自然的產物，並不與其他自然相矛盾，而是與其他自然相適應的」。(恩格斯：『反杜林論』，四四、四五頁)

但在同時，馬克思主義批判了和克服了十八世紀唯物論所特有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恩格斯說——以三種主要的方式表現出來：(一)以純粹機械的觀點去解釋一切自然現象，宇宙被形而上學地理解為不過是凝固的分子之龐大的總體，而一切事物都被用機械學的古典原理來解

釋。(二)因而引起了『不能把宇宙當作過程去理解——當作在歷史過程中發展着的物質去理解』。和(三)『在歷史的領域，同樣缺乏着歷史的觀點』，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不能予以說明。(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三六一—三八頁)

其次，馬克思主義跟黑格爾的辯證法有着密切的關係，黑格爾的辯證法曾經提出普遍發展和轉化的觀點，辯證的發展法則的觀點。

黑格爾寫道：

『正確地考查和理解辯證法的性質之極端重要的。在真實的世界中，無論任何地方有着運動，無論任何地方有着生命，無論任何地方有着任何事物出現，便有着辯證法在工作。辯證法同樣是一切知識的靈魂，因為它是真正地科學的。……它的目的是從事物自身的存在和運動中去研究事物。……有限的一切事物，與其說是安定的和終極的，毋寧說是變化的和暫時的；這正是我們所說的辯證法，通過辯證法，有限的爲物，被迫地在其自身直接的或自然的存在所不能及的地方忽然地轉變爲其自身的對立物。……我們已經看到作爲普遍的和不可抗拒的強而有力的辯證法，在它面前，沒有一件事物能夠停止不變，雖然其自身似乎是穩固的和安定的』。(黑格爾：『小邏輯學』)

，一四八——一五〇頁)

但黑格爾並沒有把辯證法作爲物質世界的發展法則來理解。恰恰相反，他主張辯證發展的發生，是『因爲工作於世界中的宇宙精神，在時間限度的漫長的擴展中，通過這些形式而獲得了忍耐，並相當了世界歷史的巨大的勞動』。(『精神現象學』，九〇頁)

這種對於辯證法的神秘的見解，把辯證法當作『宇宙精神』(這『宇宙精神』在創造世界歷史中『實現它自己』)的工作的方式，是被馬克思主義所排斥了。馬克思說：『在黑格爾看來，人類頭腦生活的過程，即思維的過程，被轉化爲『獨立的主體，實在世界的創造者……反之，在我看來，觀念不外是被人類精神所反映並轉移成思想形態的物質世界而已。』還有——

『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爲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殼中，發現合理的核。』(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

在採取了唯物論的立場，但排斥了以前唯物論機械的和非歷史的特點以後，馬克思主義已經能夠把黑格爾辯證法的觀念中『合理的核』結合成唯物論的哲學。(附註) 跟以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相反，辯證唯物論包涵着——

「這偉大的基本的思想：就是世界不是被當作既成事物的綜合來理解，但只是被當作各種過程的綜合來理解，在這些過程中，表面看起來似乎一成不變的事物以及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精神畫像——概念，乃是在發生和消滅的不斷變化中的。」（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五四頁）

從唯物論的觀點看來，辯證法成爲「外在世界和人類思想一般運動法則的科學」。（同上）

這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在其根源上，是以前哲學——十八世紀唯物論和黑格爾辯證法的最進步的產物之同化和批判。

然而，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發展中的地位，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身的內容，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作爲一個整體來看，是不能了解爲僅僅是黑格爾唯物論或唯物論加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過去哲學單純的繼承，而是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轉化了哲學的全部特性。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意味着另一個哲學「體系」的出現，附加到那些過去潮流的目錄中去。它標誌着一種革命的改革，一種新的哲學使命和方法及其與科學關係的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在本質上，不同於一切以前的哲學體系——甚至是最進步的哲學體系。」（日丹諾夫：「論哲學史」，刊於「布爾塞維克」雜誌，一九七四年

第十六期）

附註：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的發展過程來說，直接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而且是先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唯心論，成爲黑格爾的信徒，然後才接受費爾巴哈的唯物論的。在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排斥了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唯心論，而吸取了它的「合理的核」。所以，Comforth 這段話，從嚴格的歷史意義來說，似乎是把事實顛倒了。——譯者。

二 作爲普羅列塔利亞戰鬥階級的哲學之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不同於一切以前的哲學，首先在於它是新的階段——近代產業的普羅列塔利亞、共產主義建造者的哲學。

第一點，過去的哲學總是被限制於爲狹隘的知識份子所佔有。他們是不能理解羣衆，並只注意於哲學的「精華」的。哲學被要求爲少數知識份子體系化絕對的真理，而不是啓迪羣衆。

舉例來說，這個特徵在柏拉圖的哲學中是十分顯著的。在他的「共和國」一書中，他特別表明哲學真理的傳授只有社會的「保衛者」才有權利享受，而「辭業」是不適

合去接受的。對於他們，他公開主張便利的「謠言」的傳播。沒有一個哲學家曾經像他說得這樣明白的。還有，斯賓諾莎（他是一切過去哲學家中最進步的一個），在他的「倫理學」一書的結末說：「一切優美的事物正如它們之爲稀罕一樣的困難」，特別表明只有被選的少數人才能走上他的到達高度的哲學道路。此外，照格爾，無疑地決不會想像到他的辯証法可以作爲羣衆消費的物品，照他看來，對於羣衆，屬於普通宗教的低級真理就已經足够了。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展開了爲人民羣衆的哲學觀念，意識地發展了作爲羣衆在爲解放和爲建造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服務的精神武器之哲學。

馬克思寫道：「哲學家只是以各種方式說明世界，但問題却在於變革世界。」（「費爾巴哈論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一種「體系」，要求爲究極真理所模寫的世界說明的方法。在馬克思主義中，工人階級的運動同化了一切過去哲學最進步的和最高的成果。它所促進的哲學，並不是與那些過去跟人民分離的某個「學派」的哲學相等的新的「體系」形態，而是作爲一種並不以究極真理自任的學說和方法，它要求像生活自身的發展一樣無間斷的發展，而其目的則以下列觀念對準着千百萬的人民：保衛他們的爲解放和爲建造共產主義的社會而進行的鬥爭。

而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同樣是被公開的黨派性所特

徵化了的。它對於敵視普羅列塔利亞和共產主義的鬪爭的觀念抱持戰鬥的和不可調和的態度。它對於哲學的問題不是泰然自若地作爲研究的對象來討論，而是情感地作爲有關於普羅列塔利亞階級鬥爭活生生的實踐事體來討論。這種戰鬥的黨派的態度，對於專門的學院派的哲學家，是奇怪而討厭的。然而這却是馬克思主義之強而有力的所在。因爲哲學的真理不是在孤獨的沉思或在學院式的討論中找到，而寧是在爲社會進步和擴大人類對自然的統治的鬥爭中找到，在反對腐敗的資本主義及其觀念和爲建造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鬥爭中找到。

第二點，一切哲學都是現存的階級關係的反映，而不論哲學家們關於他們自己怎樣想法，他們的哲學不能不是階級觀點的表現。每一種哲學都是一個階級用一種固定式表示出來的世界觀，一種使一個階級意識到它自己的地位和目標的方法。但剝削的階級，甚至當他們還在扮演着進步的社會任務的時候，決不會面對他們的剝削制度的實在性質，他們的真正的社會目標，或他們自己的制度之過渡的性質。相反，他們曾經在他們的哲學中發展了一種「虛偽的意識」——一種偽裝了的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目標的反映，一種以他們自己的把事物看成永久真理的方法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正如他們曾經有過偉大的成就，這個同樣曾是一切過去哲學的基本的特徵。

但普羅列塔利亞却與別的會經扮演過主導的歷史任務的階級不同，他們的目標並不在於建立它自己的階級剝削的制度，而且在於廢止人對人、階級對階級的一切剝削。

這就意味着：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對於社會目標、人類彼此間的關係、和人與自然間的關係、是無須用哲學或神學的『體系』的術語，作任何思想上的偽裝的。它對於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過程，寧是需要竭力去研究和了解它們的本來面目，以便保衛人類從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建造無階級的社會和為擴大人類對自然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同樣表現了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表現了哲學中的新的發展。在馬克思主義中，哲學破天荒第一次成為科學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我們關於自然和社會的觀念，以及我們用定式表現出來的實踐的社會目標，不能立腳於任何第一原理的體系之上，而必須從經驗派生出來，從變革世界和變革社會的社會活動中派生出來，從現實過程的科學研究和它們運動法則的概括化中派生出來。在這兒，馬克思主義不同於一切以前的哲學。

三 作為科學的哲學之馬克思主義

其次，馬克思主義所發展的世界觀是一種科學的見解。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哲學，堅實地立腳於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的成果之上。這樣，它在建立哲學與專門科學間的新的關係上有更重大的意義。

現代世界證明了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後者會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並發展了它們自己的方法和研究。然而哲學家們却會繼續地而且仍將繼續地試圖以某個科學以外的真理體系來說明關於世界的究極性質，并宣稱全部人類的知識必須適合於第一原理的範疇。哲學被理解為超越於科學并離開科學的一種學說。

科學自身的發展，日益證明哲學體系的虛偽，和顯示出：這種體系不論在知識發展中會經扮演過何種積極的任務，然而它們是不會再有什麼作用了。

這樣，特別是由於在物理學上能力轉變法則的發現，以及在生物學上細胞學說和進化學說的發現，恩格斯早已在他的時代寫道：科學業經——

『到達了這樣的點上，在那兒，我們不但能夠把各個特殊領域的自然過程間的互相聯系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證明，而且能夠把這些特殊領域自身的互相聯系加以證明，這樣，藉助於經驗的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我們能夠以一種近似的系統的形態，對於自然的互相聯系表現一種綜合的見解出來。』（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五六頁）

因此——

『現代唯物論……再不需要任何超越其他科學的哲學。對於每一種科學，一經提出這樣的要求以後——就是說，要它們把自己在事物及其認識的總體上的地位弄明白以後，那麼，任何特殊的研究總體的科學都是多餘的了。於是，從至今為止的全部哲學中仍舊獨立地保留下來的，是思維及其法則的科學——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餘一切，都歸入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中去了。』（恩格斯：『反杜林論』，三二頁）這些說明宣佈了新的科學的哲學的誕生，在與專門科學不可分離的關聯中發展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科學的這種不可分離的關聯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其所以不同於以前的體系，就在於並不作為超越其他科學的一種科學而出現，但只是作為科學研究的一種工具——作為深入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而出現，並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豐富這些科學。』（日丹諾夫：『論哲學史』，刊於『布爾塞維克』什誌，一九四七年第十六期）

這種工具和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的學說，即『外在世界和人類思維一般運動法則的』學說，這個學說被應用到全部科學中去了。

不從過去的哲學，唯物辯證法並不是任何先驗推理的

產物。恩格斯寫道：『在我看來，問題決不是把辯證法的法則建立在自然里面，而是在自然中發現這些法則，並從自然中把這些法則引導出來。……自然是辯證法的試金石。』（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七，二九頁）

科學的每一進步，實驗技術或社會經驗之每一新的發展，使科學的概括化提供了新的材料，使唯物辯證法的一般概念擴展起來，因而以新的法則、新的原理、新的概括豐富了科學的唯物論哲學之內容。

所以，辯證唯物論對於世界的看法，以及對於思維過程（藉助於它，我們獲得了對於世界的認識）的看法，乃是從社會經驗和從科學結果的一種概括。它並不以究極性自任，但相反，他要求以科學知識的每一擴展以及進步人類的累積經驗之創造的進步。

舉例來說，在今天，物理學和生物學之最近的發展，以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蘇聯民主主義所策劃出來的到社會主義的新的道路，所有這一切，都給新鮮的哲學的概括提供了材料。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這方面找尋出來以豐富唯物辯證法的概念，從而為鬥爭、為社會進步、和為人類對於自然統治的擴展而創造新的理論的武器出來。

同時，在專門科學自身間的關聯上，科學結果的解釋上，以及個別科學和科學觀點的關係上，必須使之不可避免地包涵着唯物辯證法的研究。

如果這個看法在恩格斯的時代已經是顯然的事體，那末，在今天，就成爲更加明顯的了。舉例來說，現代物理學，在其原子以下的現象的研究中，證明了世界不是各種事物的綜合，而是各種過程的綜合，在這些過程中，一切事物經歷着不斷的變化和轉化；並且更在實際上估計到我們只有在變動的世界過程中——只有在與我們的研究對象相抵觸的過程中，才能獲得知識。爲了這個理由，物理學家們已經認識到他們前此所盲從的哲學見解之不適合，而宜稱新的「認識論」的需要。

恩格斯說，科學——

『再不能逃避辯證法的綜合。但是如果科學不忘記自己已經驗所搜集的結果只是一種概念，而應用概念的技術，不是天生所有的，也不能得之於通常的日用知識，而是需要真實的思惟工作，——如果科學不忘記這些，那末，它便可以很容易地促成上述的過程（即轉入辯證法觀點的過程）。』（恩格斯：「反杜林論」，序文，一九頁）

這個「真實的思惟工作」是在辯證唯物論中具體表現出來了。

辯證法，如列寧所指出，『包括着認識論，後者也必須歷史地看待它自己的主題，研究和概括知識的起源和發展，從無知到有知的轉化。』（「列寧選集」，第十一卷

，一七頁）

在現代科學看來，爲了說明其自身的結果，爲了使現代科學聯成一氣，爲了研究的計劃和使問題用定式表現出，爲來了使結果和問題跟人類經驗的總體和社會進步的實際鬥爭關聯起來，在辯證唯物論中具體表現出來的知識發展的形態和「應用概念的技術」之科學的見解，日益成爲不可缺少的工具了。

馬克思主義所建立起來的哲學與科學間的關聯，可以被理解如下：

（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世界觀，及其對認識方法和辯證法的發展法則的見解，並非立腳於先驗的原理之上，而是立腳於科學的結果之上，跟着自然過程和社會過程之科學知識的進步而要求進一步的發展。

（二）唯物辯證法的法則和方法，成爲科學知識進一步發展的工具。

（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看來，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擴大了——如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統一性，科學研究的計劃和組織，以及通過各種方式科學爲人類的進步目標而服務。

總結起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徹底的、科學的、唯物論世界觀之結論。它並不試圖把物質世界「解釋」爲精神的創造物，神的思想、目的等等的實

現。它把人類看做自然的產物，它研究實在的物質過程，它們的交互關係和發展法則。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主張：現象不能當作固定的和分離的「事物」來理解，只能從它們的變化和交互關係中去理解。它強調辯證法的現實發展的法則，是從現象中對立傾向的鬥爭所喚起的，在其中，緩慢的漸變相關地發生了突然的質變，從此出現了新的對象，新的物質運動形式，表示新的質量和新的法則的物質組織之新的水平。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把我們關於世界的認識看作辯證地發展的。人類的知識並不在於固定的、永久的思想範疇的應用，或在於感性材料及其關係的單純的記錄。知識是從無知到有知的永無終止的轉化中獲得的；它是一種社會的過程，在個別經驗中重覆着，不可避免地與外在世界發生交互作用，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發現過程、批評過程、重新用定式表示的過程、就範時和新概括的發展過程。

知識不能立腳於抽象的第一原理之上，而必須立腳於科學的研究之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從下述的信念出發的，即科學方法可以應用於一切存在領域（包括社會領域

和心理領域）的研究之上，而且它是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之上，喚起了人類對於理解和控制自然力以及他們自己生活的條件而進行鬥爭，因而獲得了知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括，提供了一種觀點和方法，豐富地應用到建立科學知識的上面去。

在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已經能夠科學地發現階級社會中，和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變革的法則，並把普羅列塔利亞鬥爭的目標清楚而公開地用定式表現出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這種鬥爭過程中發展起來，而且仍將發展下去。馬克思主義以一種科學對準着進步的人類，藉助於科學，指導其勝利地建立共產主義的課題。

譯者附記：原文尚有「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的哲學」一節，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評述英美最近的哲學及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因其論點譯者不能完全同意，且對於中國讀者亦較生疏，故未譯出，附此申明。

——譯自英國「現代學刊」(THE MODERN IN QUARTERLY)第三卷第二期，原題為「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

裴納爾 (J. Bernal) 著
徐 堅 譯

適用於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話，同樣適用於哲學和科學。現代科學的趨向，無論在觀點上，組織上，在對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的關係上，都是不斷接近着馬克思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接近常常是自發的——即從對於自然力的認識和控制的發展上，從這個發展與經濟政治形式的發展之交互作用上、發生的。如果馬克思主義早就更快地深入科學界中的話，這些成果或許能更清楚更簡便地達到；但是，事實雖然並非如此，却也給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基本正確性提供了顯著而獨立的證明。現在逐漸得到普遍地承認：無論在科學興趣在宇宙各部份的比重上，無論在科學發現的表現方式上，科學都反映着時代的社會經濟氣氛。舉例來說，從達爾文「物種原始」一書的原來的表述中，我們容易看到十九世紀自由競爭的清靜的反映。事實上，達爾文自己就常常承認，適者生存的觀點的表述，要感謝爾馬爾斯。可是，同時這種類似點後來却被另外一式所應用了，從假定的自然界的生存鬥爭所抽出的教條，却用來證明：初期資本主義的更反社會的 (Anti-social) 特點是正常的；在這一種傾向上，斯賓塞將永遠是一幅諷刺畫，並且後來成爲納粹種族理論的基礎。

近六十年的科學，特別是一八九五年以來，發生了一個革命，這個革命就其規模來說，和它在十七世紀中葉和十八世紀末葉所發生的革命，——即與加利略和牛頓有關的革命和與拉伏錫和達爾頓有關的革命——同樣重要。一八九五年以來，物質的原子構造已被詳細證明；量子論和相對論已經研究出來；化學已變成物理學的一部份；生物學和發生學把生物學的很多部份化爲化學和數學。最近半世紀的發現，在許多方面，使我們對於無機和有機的體系的行爲，得到更實際可靠的知識，使我們接近於這種知識的程度，比較以往的所有科學發現全體都要深入得多。

原子時代

這個學問上的大革命，在原子彈的製造和應用上，已達到最高的表現。廣島上原子彈的爆炸，一方面表示科學給人類控制自然的巨大力量，一方面表示舊制度極端的和罪惡的無能，它除了把它用在恐怖和毀滅以外，不能用在別的用處上。原子能的應用，配合着現代科學其他一切發展，代表着人類控制自然的前進一步，比起地球上過去任何進步來，比起火和農業來，這一步是偉大得多，激勵

科學的統一

得多，革命得多。它表示人類能力的唯一限制，只是在社會中，而不是在自然中。

可是，有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在科學內部，這豐富的知識，這些証實了的新的關係，非但沒有啓示出一幅比較規律和連貫的圖景，倒反而得出相反的結果，牛頓所規劃復經十九世紀科學家自以爲最後完成了的科學體系，給它擾亂和破壞了。科學的新進步，引起對科學的基礎發生最尖利的批判和修正，這種批判現今還方興未艾。

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各種科學觀點的修正的本質，我們會發覺大部份屬於基礎的哲學性質的。它們并不影響到科學的實用的預斷，但它的確影響了它的本源的基礎。它們似乎都趨向於同一個方向，發生了離開十九世紀所謂常識的科學的唯物觀點的傾向。現在，這種批判自然引導一批人——其中包括着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放棄一切，狂亂地投入神秘主義和迷信（註一）。他們的哲學世界，（不論他們承認與否，他們總是有了一個哲學世界）是建築在兩重的基礎上的：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堅硬的事實的世界，其中無數萬萬的原子給合於牛頓定律的許多力量緊緊結合着；另有一個是幻想、宗教、和道德的世界，這個世界，或者根本沒有定律，或者服從於聖經中得出的定律。

現代科學的發展使得這個立場難於維持。堅硬的世界證明只是在某種關係上適於我們直接體驗的經驗範圍。我們所以知道一個桌子或一粒彈子的行爲，是因為它們的體積不大不小剛適於我們。我們設法使原子和星雲同樣動作，如果它們不是如此，我們就說宇宙不可思議。當擴張我們經驗範圍時，科學告訴我們，每一水準的體積，每種等級或複雜性的水準上，都有它自己的規律，我們的常識上的規律，不過是適用於宇宙中一小部份的規律，雖則這個部份是有關係的或者對我們最有關係的。

同時，人類學、歷史、經濟學、特別是心理學等社會研究，告訴我們說，人類世界或精神世界，並非受不變的人性或神聖的制度所強制地支配着的，它有自己複雜的多的發展和行動的規律，這兩個世界實在不是分開的，倒是經常混合在一起，我們可以舉動物的行爲爲例：一方面它可以用來巧妙地說明物理化學性的神經反應，另一方面它可以用來和人類的情緒的作用並比。在此種科學統一的意義上，現代知識的整個趨向是向着馬克思等所強調的方向，今日實際的科學家越變越覺得二重立場的難於維持。他們看到自己研究範圍內的成功，有賴於其他一切

(註一)參攷斯新著神秘的宇宙(Sir James Jeans,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曼廷著物理世界的本質(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

科學工作範圍的密切的合作和瞭解，他們開始感覺到爲了在自己的工作上不受成見所限，爲了指出可能有結果的研究途徑，研究歷史研究社會，是十分重要的。

物理學上的辯證法

辯證唯物論的別些方面，日益反映在各門科學的內部發展上，當識觀點的最困難和最大的破綻，表現在現代物理學。現代物理世界的圖景充滿着矛盾和對立，是舊邏輯失敗的鮮明例證。最尖銳的例證就是放射現象的本質。光究竟是由微粒組成的，還是由波浪組成呢？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繼續了多年；現在我們知道不僅是光，連電子和原子本身也一樣，同時是波浪又是微粒，或者寧可這樣說，它們是可以波浪又可以微粒的一種東西。這些概念的差別不過是微粒是特定時間在某處的東西，波浪是在某一段時間發生在某一部份空間的東西。兩者的分別在常識上似乎是容易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就放射現象來說，我們再也不能確證一個微粒的位置，相反地，波浪的行程却是可以定出來的，這上面，兩種完全透透。

另一個可以拿來說明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在物理學上稱爲協同現象的東西，例如固體融化的過程，現在不復當作某一原子的性質，却是一羣原子由於它們共同的相互作用作用的性質。我們可以說，由一個原子開始，它的運動擾

亂着它的鄰居，但當它的鄰居受了擾亂時，原來那個原子的束縛就放鬆了，當運動充分大的時候，整個體系互解了，或者用我們普通的話來說，「融解」了。這裡有趣之點是，我究竟以那一個原子開始完全是任意的事。融解的特徵決定於一般的構造型式而不是決定於任何特殊的部份，它是決定於集團的性質，決定於作爲體系的體系的性質。協同現象說明着量積爲質的性質，說明着不斷量變引起質的飛躍。物理學上類似這種的現象，使我們了解和接受辯證觀點，比較五十年前容易得多。

物理學上的歷史因素

最顯著的恐怕是歷史因素的出現。物理學上的規律，和生物學上和社會上的規律不同，往往被看成是不變的；物質的基礎，物理學上的因素，被看成永久的；它們代表着柏拉圖理念的體現，但是自從五十年前發現了放射作用起，我們看到物理學本身也漸漸變了，變得和達爾文在前四十年所引起於生物學的那樣，進入一種相對的進化的狀態。近年來原子核物理學、宇宙線和宇宙論(Cosmology)的研究，得出一個偉大的總結，說明物理世界是體現着宇宙的偉大而實在的歷史變革的成果，這個變革發生的時期，誠然在幾十萬萬年以前，但仍然是在過去的某一時期發生了的。各種元素，按其在地球上的豐富或稀少，本身表

現出它們在末成爲行星或星河之類以前它們在其中形成的那個非常集中、緊縮和火熱的宇宙具有什麼特徵。星河是河是一次爆炸形成，爆炸的結果，由於把元素分散了，只讓着原子中有些微的變化，或者如我們所說，凝固了它們的平衡，同時給了我們現在所任的展開着的宇宙。現代宇宙學（Cosmogony）用這些大不相同的狀態之間的突變，替馬克思却格思所勾劃出來的系列頭上，再加了二三個構成等級的辯證變化的階段。隨着科學的進步，我們還會在系列頭上再發現幾個階段，靠着我們本身的努力，我們將系列的尾上加上幾個。現代物理學進展所教導我們的是，律律并非絕對的永久的真理，時它們相等，除非表示我們沒有能力一下就看出同一事物的不同說法。定律是相對的和發展着的關係，不僅就我們對它們的發現上說是如此，就一個物質宇宙的實際歷史進化來說，亦是如此。

社會科學中的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是發源於社會科學的，在社會科學內，不僅馬克思和昂格斯的理論觀點影響了和改造了我們的知識，并且他們所預言的社會進化的實際結果，也影響了和改造了我們的知識。自由競爭制度，曾被譽爲事物的自然秩序，曾被馬克思表示爲一個過渡的階段。自由競爭制度消滅了，舊經濟學也破產了。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現在

的趨向是混成一種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其中經濟決定論日益被認爲是研究的導線。心理學本身傾向於擺脫它高度個人主義的性質，這種性質是爲治療游手好閑的富人的精神病這種實際需要所引起的。在社會對於個人的一般迴避過程中的社會因素的影響，變成理解人心的鑰匙。這裡，注重現存形式的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又顯示出來了。我們的理智和情緒的反應本身是與過去一定歷史事件連結着的心理的遺跡，這種遺跡的流傳，並非由於什麼神秘的集團精神，而是由於家庭、學校、工場中間的正常的文化流傳機轉：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最後可以控制的。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研究上的價值

所有這些例子，只能指出今天的科學家，即使他並不清楚他是在運用辯證法，甚至否認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任何影響，它還是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用辯證法處理。自覺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或許說，所有這一切都並不能幫助我們的結論，因爲現代科學發明中最大多數並非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者所做出的。這誠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不過表明在類似的社會影響下人類思想交流的不可避免的傾向。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得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是完全可能的，這個事實可作爲馬克思主義的有用性

的一個獨立的指示，但是它決不能証明，如果自覺地應用着馬克思主義原則就不會更快更容易地達到那個結論。

今日的科學家，已不能再忽視馬克思主義或利用那種思想方法，在理解 and 實踐上完全精通了這種思想方法之後，會使我們理解世界的和處理自然和社會問題的集體能力有一個新的躍進。直至現在，除蘇聯以外，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不是一知半解的科學工作者，還是很少數，在這少數中，馬克思主義觀點亦還是在戰前幾年才認識的。雖然如此，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如居禮 (Joliot Curie) 哈日 (Haldane) 或却德 (Gordon Child) 都是在本行中知名之士。

可是，應用辯証法唯物論於科學的初步成果，我們在濃聯看得到，濃聯實際科學工作所應用的設備和應用的分析與歸納的內在的邏輯，和我們在別處和別時的科學上所看到的並無兩樣。辯証法唯物論並非用來代替科學方法的苛求的，它到科學上指出發現的途徑和提供這些發現有效的辦法，換句話說，它對於科學的進展，注重於戰略而不是注重於策略。這並非說它與詳細的科學工作無關，不過說它在這上面的影響是間接的，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能看得很清，應該能避免成見和俗見，成見和俗見使人連鼻子下的東西都看不到。

科學工作的計劃

馬克思主義並非亦不自命為尋求細察發現的普通方法，人類的個人品質如細心、忠實和想像，仍和往常一樣，必要，辯証法唯物論最有用的地方是研究範圍、着手方向、與別的工作者在同範圍或異範圍內聯系的方法等等的選定。實際上，它是這樣的一種哲學，是把有計劃的科學發展代替許多個人的科學發展，後者各個人追隨着自己的軌道，彼此的關係，自覺地是由於推進了科學傳統，不自覺地是由於追隨着社會決定的傾向。這並非是說大科學家不是從一開始就計劃了自己的工作，有些如巴士多那樣，甚至圍聚着一批人將研究範圍自相分割，可是這些個別的勞力却是孤立的，不穩固的。

科學就整個說來有過高潮和低潮。在個別問題上的成就，甚至表現出得更利害的波動。這個或那個問題的研究上，其進步的決定因素，是發現了什麼和應用了什麼之間的關係。

社會的經濟的需要，推動人們去研究某一部門的東西，這些研究反過來向經濟向社會發生影響，雖則這種影響往往在時間上就擱了很久。最初的科學研究動機和最後發生普遍的實用效果之間，可能間隔着一百至五十年。例如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大規模化學工業的開始，提高了研

化學的興趣，這個推動作用一直有力地繼續到十九世紀，但是到十九世紀末化學研究才大規模地在工業上發生效果，那是科學的化學工業特別是染色工業大量發展的時候。這種因果關係，在蘇聯證明它是不必要的以前，一直被認為是一條自然的法則，和適者生存或自由競爭一樣，大家以為不應該去干涉它的，以為干涉了它就怕會推翻了它巧妙的結構，我們現在知道了，根據我們在戰時的經驗，只要把科學工作適當地組織起來計劃起來，或者，只要把研究工作、發展與生產變方面地聯系起來，讓生產問題回到研究工作上，再從研究工作回過來發展生產，那麼這種時間上的長期耽擱是可以縮短的。但是要計劃科學研究工作，就不能不聯繫着一定的供需制度，不能不看到這就等於一個社會分析。只有從社會分析出發，我們才能說科學應該起什麼作用，才能說它怎樣才能起這樣的作用。正是在這個廣泛的意義上，辯証法唯物論給了科學進步以偉大的指導力。

科學在蘇聯

辯証法唯物論的價值，不僅是、甚至不是主要地是，「由過去和現在的科學發展的分析中表現出來的，倒是表現在其對於將來的意義上。對於將來的科學，社會化的計劃工作是絕對必要的；這種計劃工作的型式我們已在蘇

聯看到。從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狹隘的科學基礎上，建立起整然成體的有力的現代蘇聯科學機構，全靠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覺的應用。在一代的時間中，文盲國家變成了科學家的國家，經得起平時和戰時的考驗。倒不是有了少數科學上的著名人物的問題，倒不是這種或那種推進了知識範圍的問題，倒是在於在處理生產上、農業上、衛生上、和戰界上的一切問題時，普通地當作科學問題來處理，當作根據被控制的試驗和統計實驗求答案的問題來處理。

蘇聯科學院的各種計劃，以一九四六年戰後五年計劃為最高點，表現出基本科學和國家需要之間的聯系形式，這個計劃是由科學家們自己作出的，指出各種科學訓練的內在需要，把它們結合起來自成一個整套。同樣各種各樣地使它們和工業、農業、和醫藥連結起來。(註一)在這個分析中，可以看到辯証法的供獻。蘇聯科學的成果在蘇聯的實際成功上已明白表示出來了，但是它還不過是最初的成果罷了。實際上發生的是，整個國家的人民正學習這種處理物質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新的辯証方法，不顧納粹德國造下了多大的破壞，他們不僅有意志並且有辦法來生產新的知識和新的建設。

(註一)參考 The Anglo-Soviet Journal, Autumn issue, 1947 (對蘇文化關係協會出版)

蘇聯科學組織，不是限制科學發展的組織，而是解放科學思想的組織；它用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的組織；它發現着和利用着自然資源；首先是它利用着人類自身的才能和智慧，我們現在漸漸知道，這是所有一切自然資源中最有力的資源。在每個種族和文化程度的每個男人女人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推進人類文化的潛在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

我們從蘇聯三十年奮鬥發展中所看到的，我們在世界其他部份也開始看到了，自從歐洲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以後，自從各殖民地國家得到局部的仍舊不穩固的解放以後，到處都有利用計劃科學的要求，把計劃科學看作最快的同時又是最有效最持久的提高生活水準的方法，擺脫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下的不決定而建立一個新文化的方法。有組織地領導科學工作來解決人類需要的這種想法，連

資本主義國家中亦一樣，到處都發展着。自然，這種想法是受着反動力量反對的，反動力量假借着自由的名義，從這邊從那邊進行反對，但是無政府狀態的自由是虛幻的，是自己破壞着自己的；它是剝削的自由而非創造的自由。十八世紀自由主義者的偉大工程其所以崩潰就由於看不到這一點。

適合於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自由，是合作的自由而非競爭的自由。人類的解放，是由於了鮮自己的限度，而非忽視了這些限度；由於接受協同工作的必要，而非堅持過時的「粗俗的個人主義」。幫助我們指導這種共同努力的骨架，是馬克思主義的骨架，這骨架不是一個堅硬的殼，不是永久如此一成不變如同成文憲法一樣而規定着人類智慧和實際成就的未來發展的東西；它寧可是一副鷹架，一到作用已完便可取去的。但是時候還未到，在達到這個目標以前還有許多需要經歷的。

劉及辰編著 近現代經濟思潮批判 資本主義

這是一本批評的經濟學說史。批評的重點是放在研究方法 and 價值論上。這本來寫的經濟學說史，顯然有它的特色。從亞丹斯密到馬多爾，這些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分在六篇中論列。附篇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歪曲者也作了批評。（港幣定價四·六〇）

世界政治

★ 陳原 著
地理講話

生活書店發行

新民主主義底歷史認識

侯外廬

(一) 民主的歷史意義

民主這一範疇，被資產階級的專政所篡竊，更被資產階級的學者所污蔑，顯得越來越不是人間的東西，一方面把它踐踏得一無所有，他方面把它形容得無所不有，到帝國主義的時代，必然地要由新的人類在新的歷史之中使它重新培植起來，重新珍貴起來，重新武裝起來，重新發展起來。

嚴格地說來，民主就是「政治的平等」。此所謂「政治的平等」僅是在「自然的平等」歷史之下，才有意義，換言之，通過人類財產的不平等和智能的不平等之社會，民主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才在歷史的進程中具有價值，如果自然的平等通貫古今，亦就沒有民主一辭在歷史上出現的。因此，階級社會以前沒有民主與不民主的分裂，在階級社會以後（包括智能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亦沒有民主與不民主的糾葛，在歷史上的一定時期有民主之花（希臘語民主謂之 *Demos-Kratos*），而到了歷史的又一時期，「民主送到博物館去」。具體的歷史是，奴隸社會的民主，封建社會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以及社會主義社會（智能猶不平等）的民主，然而又要明白，這一

串民主史，並非如一般資產階級學者所想像的什麼「純粹」民主，「全民」民主，相反地，民主毫不純粹，毫不全民，由政權方面而言，具體的歷史又是，奴隸主專政，封建領主專政，資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專政。

民主與專政好像不相容，而實相成。祇有「自由主義」者才否認專政，而空談民主。我們的了解是，歷史不是說凡有「民主」都相一致，而是由低級的到高級的發展，在資產階級的專政形式之下，民主比過去顯然要高度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民主更比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更高到一百萬倍。因此，有民主的社會，都是民主其表，而專政其實，其間的差別在於誰在專政，為誰民主，在古代與中古，民主的形式與內容二者都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的形式高而內容低，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的形式須適合於民主的內容。一到了內容上連財產以及智能二者皆達到平等，不但沒有資本家與勞動者之分，而且沒有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分，那麼民主形式亦就和黃金去修理圓筒似的，無所用其花樣了。——民主就是這樣的歷史。

(二) 舊民主主義的歷史意義

由狹義的民主史而言，民主是近代的產物。近代資產

階級性的民主，正是商品生產與等價交換關係的反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財產平權與勞動力平權二大支柱之下，反對了封建的財產「特權」，反對了封建的等價關係以外的剝削「特權」（封建制重「特」字，現在中國「特務」之「特」，「特費」之「特」，「特捐」之「特」，「特別法庭」之「特」，都是封建的特徵），其典型的形勢就是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

然而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各國並非一模一樣的，它有程度不等的形式。由法國革命以來，民主的歷史，大體上講來，第一從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青春理想，就轉變而為德國式的由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第二從此一改良主義，就轉變而為東歐帝俄和封建妥協的自由主義，第三由自由主義轉變而為抹殺人民權利的國權主義，第四由國權主義更達到末期毀滅文明的法西斯主義。我們知道，越到資本主義的後期，越和封建合抱，最後把資產階級的優良傳統一齊取消，再版封建。越到資本主義的後期，越和工農對敵，最後把民衆代替以種族，如「亞利安主義」，如「美國主義」。

很明顯的，當資產階級的民主可能向激進路上進行時，又變得成爲不可能的了。以法國一八三〇年無產階級參與民主爲轉折點，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祇有照資產階級專政的意願去設計，而不讓無產階級比它跑得更快一步

，各國的專政者，寧願意保存封建腐朽（主要爲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不願使民主稍進行得澈底些，以滿足民衆的民主要求；寧願意把歷史拉退而遺害後人，不願意再正視資產階級初期進步的政綱，而創造活的歷史。因此，馬克思早已有一「進步的亞洲，落後的歐洲」的警語，列寧有俄進國「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提示，而以沒有民衆的參與而僅形式上改變政體如土耳其革命，不算民主革命。所謂「代議制度」事實上成了百萬富翁的發洩器，而非如初期抗議封建特權的納稅人自覺，所謂「國家機器」逐漸成了壓迫大眾的東西，常備軍和官僚制度比封建更不廉潔，法西斯的政體就寄生在這些腐朽物上滋長起來。

帝國主義時代的金融寡頭專政，是一個獨占資本家的政權形式，過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取得的平等形式（財產與勞動力），所謂財產自由與勞動自由，達到了財產的壟斷，勞動的貧困。民主原來是商品生產與等價交換的結果，而現在變成了最不公平最自由的獨占資本的裝飾，法西斯的政體，便連這裝飾品亦認爲是它的障礙物，數典忘祖，剝奪已盡，雖民主的最抽象形式而無內容，在毀滅人類的戰爭製造之中，亦無絲毫存在的餘地了。戰前的軸心帝國，戰後的金元王國，其軌一轍，不容分別。由這裡可以知道，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是以「人權宣言」爲始，而復以反人權宣言爲終，是以政治平等的反特權爲始

，而復以另一不平等的特權樹立為終，是以打倒封建舊人類的青春理想為始，而復以毀滅另一新人類的復古反動為終，是以遺棄腐朽歷史為始，而復以恢復古舊制度為終。

舊民主主義在反動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合抱的自私以至自殺之下告了毀鐘，歷史調於人類的再也不能重演，但也並非簡單的否定。這在總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而其進程不一定就能把資本主義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民主劃出一條鴻溝，不可逾越的出于楊而入於罅，由此岸簡潔地跳到彼岸，反而根據列寧主義的民主理論講來，無產階級沒有理由不在各種戰線上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澈底貫徹而奮鬥，把此種民主進行到底，就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門戶，祇有考茨基和孟雪維克才把民主的階級性取消，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復活說教。列寧所強調的「革命的民主主義」，在今日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發展。

(三) 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義既不是要將資本主義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民主劃一鴻溝，截然分離，不可逾越，那麼它是不是使二者一舉其功於一役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凡一次無間地把歷史按自己的主觀想法切斷而企圖一勞永逸者，不是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就是托洛斯基派的反動的「無間革命論」（亦譯做不斷革命論）。新民主主義與此相反的，它僅是在最初的立基點上打下了廣濶

的深厚的地石，容讓歷史進步的條件，變成根據，有依據有步驟地使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而培植着社會主義現實性之順利轉化。因此，它不是開始即終結，而是開始孕育着終結。它在甚多的階段長鍊之中，一環一環地通過，而完成全鍊。這就是和舊民主主義不同的一點，舊民主主義約束於一環而斬斷全鍊的發展，新民主主義則在環鍊二者之間堅強地做辯証法的把握。

今天的歷史，不可否認的，一切都從屬於社會主義，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固然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而與十八世紀的各國國民運動僅從屬於資本主義者已經成為另一範疇，即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亦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而與典型的資產階級專政儼然不同了。此所謂社會主義之一部分，是在縱連的歷史方面而言，即是說問題不但不能與社會主義為敵，而且要與社會主義聯結，如果問題脫離了社會主義的領導，懼怕社會主義的因素，必然仍墮於舊民主主義，這在先進國就產生民主的否定，在後進國就產生民主的天折。另一方面，此所謂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卻不是一切皆以社會主義的手段進行，在橫連的歷史上而言，各國的民族民主的任務，程度不等地有的應着重為了反封建專制而戰，有的應着重為了反獨占資本而戰，不論那一面，無產階級沒有理由不堅決參加各樣程度不同的民主

戰綫，沒有理由不爲其民主的徹底勝利而戰鬥。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不但是在清算法西斯的歷史，而且在清算一切從古代中古以至近代所殘餘的一系列腐朽古董，「爲死的所苦，又爲活的發展不足所苦」，死的東西已經集聚一起，獨占資本家，封建地主，甚至復活奴隸世界的軍事法西斯，舉凡舊的可利用的莫不利用。而活的因素並非完全是社會主義的本格成分，尤其在各國要求脫離封建剝削的大羣農民，仍然賴於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以求解放。因此，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是結束歷史「序幕」(「序幕」二字用經濟學批判序語)之前的一段艱巨工作，歷史「正文」已經到來，而「序幕」則非如撕一頁書那樣單純的。

有的人從左的想法，在資本主義面對世界一般危機，正敲了喪鐘的時期，感到新民主主義不可理解，又有的人從右的想法，提出「新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來魚目混珠，這都不是正確的看法。我們且從兩方面對這些懷疑作一解釋。

(一)今天世界各國的國內或整個國際，皆有發展的不平衡現象，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或已經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國家，除了資本主義的成分，還嚴重地存在着封建制度或甚至封建制度以前的殘餘，這些古舊制度的殘存，就歸罪於舊民主主義的劃地自限政策，而爲各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所珍貴，所培植，所復活。歷史的任務，發展新的

固然倍加重要，而掃蕩舊的，亦正爲新的長成所必需。

因此，使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正爲社會主義黃土填道，清水灑街，實不能與舊民主主義僅約束於資本主義，而不讓新的人類無產階級比它跑得更快，一切依照資本家專政來設計者，可同日而語，何來一個「新資本主義」？復次，新民主主義又不能與無產階級專政等一視，亦不能與蘇聯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相提並論。在東歐新民主國家，舊的國家機器雖然沒有完全軋碎，然而改造了，實現了「廉價政府」，新人類雖然沒有如無產階級專政獨掌政權，然而大踏步走上歷史舞台，同盟了農民與小資產階級聯合專政了，在改造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逐漸長大以至於領導，這種政權的強大，依據財產與勞動平權的發展而益強固，可能代替了純粹無產階級的專政，至少是爲此一專政而填下和平轉變的道路。同時，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確吸收了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教訓，使落後的依靠於進步的而發展，使落後的與進步的相鬥爭而被克服，然而，在新民主主義國家，克服落後正是民主主義前進政綱，而非如魏聯之克服落後在某種意義上爲了進步而後退一步者，大有分別。前者存在着資本主義成分，後者則暫時恢復資本主義成分，前者在社會主義序幕之前掃蕩古舊世界，後者在社會主義正文之後爲社會主義建設準備條件，前者作爲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階段看，後者則名之爲

過渡期經濟。

在舊政協開會的時候，反動派的託派走狗葉青之流，編排說要實行二月革命，隨後再來一個十月革命。這是無恥之極。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正不讓一個舊民主主義的二月革命再演於世界任何角落的。二月革命反而是今天法西斯主義的花旗帝國所幻想的一類所謂「自由主義」的改良，用以打擊新生的人民力量。也有人說現在還須要一個俾斯麥那樣人物，出而領導世界，這也是錯覺。新民主主義，就是清算俾斯麥的「民主無花果」（李卜克內西語），在一切戰線上不但沒有俾斯麥政策的重演歷史，而且也要為民主的「高漲」，民主的「補充」（二字依列寧語）而奮鬥，俾斯麥所依靠的死封建地主，必須在土地改革中來肅清的。俾斯麥——克倫斯基前後和封建的妥協，在今日正是依靠新人類的新民主主義鬥爭的目標。

(二) 新民主主義是列寧主義的發展，把列寧一九〇五年提出的一要就是打倒沙皇實行民主的決定勝利，要不然就被封建所吞噬，擴大到世界落後國家的民主革命一切戰線方面。在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列寧正確地說，資產階級義沒落了，要實行民主革命，沒有什麼「維新」之路可尋，日本是最後的一次改良，祇有徹底民主革命才是可能而必要的途徑，這種革命不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而是「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他在批評

民國元年孫中山的思想一文中，更預言到，「孫逸仙的民主政綱，將來必有社會民主黨（許當時的國際組織）把它珍貴起來，培植起來，發展起來」，就是說，後進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使其完成。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毛澤東先生提出，加劇，並解決，是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將成為東方歷史的模範。「依靠自己國內廣大的居民的團結，可以獨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第一次大戰以後有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戰以後更可將此可能性轉化而為現實性。尤其如列寧所說，把土地政綱的民主高漲執行到底，不僅是民主之路，而且同時掃清封建獨占地租的障礙，就為將來社會主義填平道路，其間沒有鴻溝交界來阻擋的。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補充，不但打擊了大彼得——明治天皇的自由主義，舊人類的改良的落後幻想，而且是由新人類青春理想創造歷史（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者，都是此項歷史中的新人類）。我們敢說，如果沒有新人類的成分執行歷史的新任務，其結果仍是舊的，而舊的在今日就非如在十七世紀，那時有形式民主的前途，在今日則是形式民主的死亡。很多人不願意整個而僅希望半途，設計自由主義的改良妥協，這在十九世紀有出現的可能，在今日則如唐嗣所言「裂一未可得半」，要就是新民主主義獲得決定的全面勝利（包括形式與內容），否則就被封建帝國主義所俘虜。

因此，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毫不神秘，是民主的高漲與補充，並為其徹底勝利而鬥爭。換言之，形式的內容的民主必須兼具，所謂表裏如一，而徒有其表的舊民主已經成爲死殼，在其下藏着帝國主義欺人的利器，所謂「自由主義」，即爲封建古舊的東西作招魂之歌。新民主主義是「民衆的革命」，削去民衆的意義，就不成其爲「新」了。（注意，「民衆的革命」一語見於法蘭西內戰，以區別於「社會主義的革命」。）

（四）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

由上面所述看來，新民主主義是對法西斯復古與一切古代中古所殘留的腐朽諸制度，作歷史的一次總清算，在縱通的歷史上而言，它是全世界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而在橫通的歷史上而言，各國內自有程度不等的民主進程，它匯合了全世界新民主國家民衆的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力量，創造新的歷史。有的國家依其社會條件已經達到社會主義化，有的國家依其社會條件，進行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都以其苛切的人類素質，立於先鋒。我個人以爲這是歷史「序幕」結束前的全世界性的聯合戰鬥，爲社會主義的發展預平道路，而非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的構成（Formation）」，因爲沒有特別的生產方法（The Mode of Production）支配着此

一社會的全性質全運動。

封建社會將完之時有神聖同盟，資本主義沒落之時有法西斯同盟，都是各別歷史階段的復古反動。然而，在典型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各國並不依樣照抄法國的板本，而都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或走上資本主義所謂「西歐化」，或走上半殖民地殖民地成了宗主國的附庸體。在今天，自從蘇聯社會主義成功之後，亦有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化，而在世界不平衡的發展之下，就不同於「西歐化」。「西歐化」由封建而轉變，保存了封建，反之，社會主義化乃是把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平權執行到底，以進於社會主義的平權（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把資產階級的平權，一部分財產平權實現了，而他部分勞動平等所謂智能平等還留着未解決的因素，猶待解決）。貫徹民主平權，是舊民主主義所辦不到的。它或者是由社會主義的革命，把資產階級的空話，以另一種行動來成爲現實，或者是由民衆的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都附加了內容，使平權的武器反刺於資產階級。兩條路不是非一定要走那一條不可的。由社會主義的革命劃一血溝，這是好像典型的路，但由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使此鴻溝可以轉化逾越，亦不是非典型的路，據列寧所指示，後者並不低於前者（參看「國家與革命」中革命與考茨基章）。因此，我個人以爲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化」的階段，而非即是

社會主義本身。在資本主義向上期所謂「西歐化」的時代，其「化」乃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融「化」，以反對了新人類無產階級的可怕勢力，以犧牲了農民的民主要求，此即「自由主義」的本格意義（中國的「自由主義」注意！）；在今天社會主義化的新民主主義時代，其「化」即以資產階級的平權貫徹到底，把不平打倒澈底（孫中山亦提出這個問題，而未加劇並解決），使工農解放，使封建殘餘消盡，使資產階級專政的舊國家機器粉碎，這自然就達到社會主義平權的門戶。現在東歐新民主國家提出的「社會主義化」綱領，就是這一歷史的代表事件。如果認新民主主義是馬列主義的修改，此種人不是惡意曲解，便是無知亂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這是一面；但二者間又是聯結的，這又是一面。所謂聯結，不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套經濟自流的投降理論，反是對於資產階級所毀棄或取消或不致執行或不能執行的民主政綱，而澈底貫徹的一列戰鬥。依此而言，我個人在嚴格的意義上不贊成新民主主義為過渡階段，它反而是歷史的正常發展。

復次，資本主義的體系裡有近代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它們已經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有機組織，而多半是落後封建的國家。新民主主義在這些國家，具有歷史的共同性（世界社會主義化）而外，還有更特殊的合法則的鬥爭。我們人以為，列寧所云「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

，正是這些國家新民主主義的先決歷史，這個歷史模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顯現。這裡面不能過分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也不能以土地平分認為是社會主義（農村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反動的），大部分經濟保有資本主義的範疇，而非「新資本主義」，因為新民主主義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合專政，不怕資本主義的因素，反而要發展那不能重斷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因而亦不可能使國民經濟「約束」於資本主義（約束二字用列寧語）。雖然歷史因了落後而本身不能立刻社會主義化，但卻是世界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化的一部分，同時民主革命的平權發展就和社會主義的平權相為聯結，環繞是統一的（參看列寧的「孫逸仙與民粹思想」一文）。不要以為貫徹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舊民主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始約束于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反是，先天由新人類誕生，後天由新人類培植，永遠是青春的。

「落後的歐洲，進步的亞洲」，在今日更有歷史意義。這是歷史的失常麼？這是馬列主義的修改麼？否！如果說歷史有錯誤，那應歸咎於舊民主制，而馬列主義正對於這一現實負擔了新任務。美帝領導的法西斯已經和封建勾通一齊，倒開歷史的車輪，因為舊民主制保留下落後的，法西斯帝國主義又扶持落後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實現農民的民主革命政綱，不但和世界新力量並肩前進

，而且亦要為掃除落後的東西而奮鬥。青年的日程開始於新民主主義，地基是鞏固的，八十層大廈亦可建築於其上而不能動搖，故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實反於舊民主制度，而可以發展於社會主義層，而老年的日程「日暮窮途，倒

行逆施」，則祇有退回古舊世界，而自拆地基。歷史的頭緒顯明得無過於今日，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大旗，不但要揮在萬里長城之上，而且要遍揮在世界各地。條條大路通新民主主義，洪濤是阻擋不住的！

★

馬克思著

法蘭西內戰

吳黎平譯

港幣一·五〇

拿破侖第三政策記

柯柏年譯

港幣一·七〇

僱傭勞動與資本

沈志遠譯

港幣〇·八〇

價值價格與利潤

王學文等譯

港幣一·一〇

生 活 書 行 店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

沈志遠

人類歷史正經歷着一次空前偉大的轉變，這是從非人社會過渡到真正人類社會的歷史大轉變，是世界被壓迫人民開始總翻身的歷史大轉變。新民主主義便是這一轉變的重大標誌。

東南歐七國九千萬人民已經解除了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多年來加在他們身上的錐錘，建立并鞏固了勞動人民自己主宰的新民主制度。同時，我國三分之一以上領土一億五千萬人民也已從國民黨法西斯暴政之下獲得了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着支離破碎日暮途窮的反動統治全面進軍，並且已經日益接近着全國範圍的最後勝利。由於這種情勢的發展，對於新民主主義各項建設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的研究，在今天已愈來愈有其迫切的現實意義了。

這篇論文，主要是想就與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及性質有關的一些基本問題，提出來作一次比較具體檢討的嘗試。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最近大半年來，國內外刊物上已發表了不少的論文，可是到現在為止，那些論文多半還停留在大體輪廓的說明上，尙未比較具體地探討到個別的理论問題，而且在那些說明中又隱隱存在着一些值得

商榷或顯然錯誤的觀點。所以這裏作者在自己的論說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評述到那些未必妥當的觀點。自然，這仍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而精深的研究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建立，尙有待於理論經濟學界諸先進之不斷的長期研討。

一 兩種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

概息一般地討論新民主主義，實在是不够的。依作者看來，現實的世界中顯然存在着兩種不同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東南歐式的和中國式的。我們假如要具體地把握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諸問題，就必須對現存的兩種不同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現實，作一番比較的研究。

先從兩者的共同性（一般性）說起。而且，因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體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產物，所以我們還須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問題上的共同性說起。

不論是中國的也罷，東南歐各國的也罷，兩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其歷史的性質而言，都是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換句話說，它

是資產階級沒落時代而不是它的壯健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既同爲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那麼革命的基本任務必然同爲反帝反封建這兩重；反帝是爲的消除國際獨佔資本之經濟和政治的控制，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反封建是爲的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爭取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解放。既同爲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沒落時代的民主革命，那麼這一革命的基本動力便同是無產階級、農民大眾和城市小資產者大眾（包括知識分子羣）；中小民族資產者，或所謂自由資產者，具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也能參加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而成爲它的動力之一；可是依附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出賣祖國和壓榨人民的大資產階級（在中國是官僚資產階級，在東南歐是當國際獨佔資本附庸的買辦性資產階級），不但不是這種革命的動力，而且必然成爲它的主要對象之一了。正因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這樣一個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在這一革命中，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演進最堅決、最勇敢、最徹底的先鋒隊作用，就必然處於領導的地位，而掌握和執行革命領導權的，又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的先鋒隊——共產黨。至於這一革命的目的，是在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者（包括革命知識分子羣）各革命階級聯合專

政的人民民主共和國，而這一共和國的政權則以人民大眾爲基礎，並由人民大眾直接普選出來的人民代表所構成，所以它本質上所謂『特殊形式的蘇維埃民主』的政權。最後，從革命的歸趨上講，中國和東南歐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同樣是開闢了和平轉變爲社會主義的前途，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是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它是被壓迫勞動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完全新的方式，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方式不相同的。

以上種種都是中國和東南歐諸國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之點；從這些共同點上證明了兩者在基本性質上是一致的，兩者都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它祇是以剷除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壟斷性大資產階級爲目的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基本性質上的一致，並不意味着兩者的完全等同。它們的差異點，基本的乃在於經濟（生產力）發展水準的高低上，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參差上。

不能否認，戰前東南歐諸國，尤其是捷克和波蘭，儘管農村裏會存在着強大的封建半封建勢力，大部分工業會被外國獨佔資本所掌握或控制，它們的經濟發展水準，國民生產力發展的水準，資本主義在全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却一般地都要高過中國。東南歐各國的經濟，儘

管基本上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兩重性質，可是這兩重性在程度上却又一般地都要低過中國。假如說中國是一個工業資本主義非常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典型，那麼東南歐諸國却只是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國家。光從生產力發展的水準上看，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上看來，中國顯然要比波蘭、捷克乃至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都落後些。

以波蘭為例，一九三五年波蘭主要工業部門的企業有二萬三千餘家，工人數達七十二萬（當時波蘭的總人口才不過二千七百萬左右）；其中採礦，冶金，電氣，化學，紡織等鎮鑰部門佔二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家，工人數佔四十五萬五千；而這些工業中有二百六十五家的工人數是在五百人以上的。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波蘭的工業化程度（重工業基礎已相當強），同時也可以看出它的生產集中的程度。不僅這樣，戰前獨佔資本也已在波蘭據有控制地位；卡特爾數目的增加可以證明這一點：一九一八年波蘭僅有四個卡特爾，一九二四年增加到六十一個，一九三五年已增加到二百零八個了（註一）。

至於捷克工業發達的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的。單就國民收入的分配情況而言，已可窺見一斑。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註二），全國一千四百萬人口中，靠農業收入為生的，約祇五百萬人；而靠工商業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和手

工業者的收入）為生的，約有六百二十萬人，就工業生產總量說，戰前捷克居資本主義各國的第七位，與加拿大的地位相等。鋼的生產量，大致和意大利及日本相等。在捷克的出口貿易中，金屬品和機器佔第二位，僅次於紡織品，而在全部出口，工業品竟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僅如此，捷克的重要工業和金融業久已發展到了獨佔的階段；最顯赫的例子便是舉世聞名的軍火工業和機器製造業的康采恩——世科達，這是多瑙河及巴爾幹各國的兵工廠，是捷克和英法獨佔資本的結晶體。

東南歐其他各國的工業發展水平是要比波、捷等國差些，但一般地都要高於中國。即以一九四六年南斯拉夫國民收入的分配情形而言（註三），百分之五四是國家積累（主要的是國有企業的盈利），百分之二〇是工人和公務員的收入，百分之一九是農民收入，百分之七則為私人資本家和手藝生產者所平分。從這些數字上也可窺見戰前南歐經濟發展的一般水準了。

我們無須再一一列舉其他各國的數字，單從上述三國

（註一）此處數字，錄自「東南歐新民主國家」一書（時代版）頁一六。

（註二）摘錄「東南歐新民主國家」一書，頁四二。

（註三）譯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英文版南國共黨代表的報告摘錄。

的經濟情況來看，可知東南歐的資本主義發展水準，確實要比中國高得多（尤其拿工業生產力與人口及領土面積作比例）；換句話說，兩方面的歷史發展的階段顯然有着前後的時差：東南歐比較前進，中國比較要落後不少。因此東南歐各國的新民主主義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二者所處的歷史條件，也就有着差異了。自然，這只能說是量的差別而已。

根據於這種歷史條件上的差異，作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渡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和在東南歐各國，首先就有着發展階段（指這一過渡時期本身的發展階段）上的先後不同。依作者的看法，作為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之產物的新民主主義，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可能經過兩個發展階段的。一個是替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準備物質前提的階段，一個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前者是完成『新式資產階級性質的澈底民主革命』之建設任務的階段，是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及奠定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為中心目標的階段，也就是『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註四）的階段。後一階段却是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及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就其對於私人資本主義及一般的私有個體經濟之關係而言，這一階段的基本任務是由限制、排擠而發展到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對於農民個體經濟則採

取改造為集體經濟的政策。

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就得從前一個階段做起。在這一階段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註五）。東南歐各國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則大致多從後一階段做起了。原因很簡單：那些國家在革命前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水準已相當高，革命後國有化經濟在工商金融業中已經佔着壓倒的優勢。例如捷克全部金融企業和一切基礎性重工業（如採礦，冶煉，動力諸部門）均已完全國有；若按生產量計算，則國有化的成份佔全捷工業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南斯拉夫的國有經濟成份更大；銀行——百分之百，聯邦的與共和國的工業（大的和中等的）——百分之百，大商業和運輸業——百分之百；按工業生產之價值計算，國有與合作社兩種成份合計共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如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一切銀行和基礎工業也大都已國有化了。自然，中國新民主革命全國勝利之後的最初一段時期內，國有經濟的比重是決不會這樣高的。

東南歐新民主各國既經實行了銀行和工商業國有化的

（註四）見毛著·論「聯合政府」前進版頁二三。

（註五）見毛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政策，它們「已解決了兩大任務：擊破了形成國內反動勢力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並且消除了外資對於諸人民共和國經濟的影響。」（註六）「人民的政權既掌握着經濟中的鎖鑰地位，又依靠着合作社的成份，它就能控制和影響私人資本主義的成份；它有可能採行一種有目的的經濟政策，一種促進社會主義成份之發展及限制與孤立私人資本的經濟政策。」（註七）「這一切新民主國家的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它們脫離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和逐漸過渡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註八）特別是南斯拉夫，在一年前且已提出「跟資本主義的殘餘做鬥爭」和「建設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口號了。（註九）

這樣，事情是非常明白的了。東南歐新民主各國在其建設之初就採取了「限制和孤立私人資本」的政策；新民主的中國却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大發展的便利」。東南歐新民主各國已「脫離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和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新民主中國的國民經濟由於私有成份的大量存在，在相當時期內却決不能完全脫離生產無政府性，而只能在基本上克制這種無政府性；它不能一開始就「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只能替這一過渡準備條件，創造前提（首先是聚集全力克服經濟的落後性，把凋敝枯萎的國民生產

力恢復起來，發展起來，替日後國家工業化奠定基礎）。這就是兩種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的差異點。

二 有關經濟構成的一些問題

如所公認，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中，大概將包括國家經濟（即國有國營的產業）、由個體走向集體化的農村經濟和中小私人資本主義及獨立小工商業等三種成份。然而這只是指大體的情況而言。假如我們比較具體地來考察實際情況時，我們就會發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係隨時間、空間和其他條件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比方說，現在東南歐的每一個新民主國家，均以合作經濟為其國民經濟的主要成份之一，而以小商品經濟為特質的個體農民經濟與獨立小工商業却已逐漸失去其為一重要經濟成份的地位而被合作經濟所代替了。私人資本主義在中國將在一定時期內成為重要的經濟成份之一，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將相當的大；但在東南歐諸國，這一成份在新民主主義建設之初即已處於不甚重要的地位。反過來說，國有經濟成份

（註六、七、八）見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英文版社論「論人民民主各國的經濟發展」
（註九）參閱南國共黨代表的報告辭（同註三）。但這方面南國的做法是否稍過分一點，作者不敢決然斷定，願意保留自己的懷疑權。

在東南歐多數國家均已佔着極大的甚至壓倒的優勢，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在一定時期內恐難有可能立即出現這樣的局面。經濟構成上這樣的差異，根本還是由於具體歷史條件之不同所造成的。

再有一層，從發展中去考察新民主主義經濟時，上述三大成份的對比關係是經常在變動的。這里作者首先要對前一節文章作一個重要的補充。當我們說，在中國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第一階段內，必須讓私人資本主義獲得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發展時，這話絲毫不意味着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是停滯不動的。正相反，即在第一階段內，國家經濟一定要比私人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只有保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發展得比私人資本更快而更堅強時，才有可能從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同時也就有可能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要不然，假如只強調新民主主義第一階段內需要盡量發展資本主義這一點，而忘記國家經濟有更大發展之必要性的話，那末這個新民主主義就只會退回到資本主義去，而決不會向前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同樣，鄉村和城市的個體小商品生產，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過程中，亦必經常不斷地循着合作或集體化的路線向前發展；因而個體小商品生產（包括小農經濟和城市獨立小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必然將逐漸減少而為合作經濟或集體經濟所代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構成，在前期和在後期是不相同的。我們有充分權利來說想這樣一種情況：即在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若干年之後，國民經濟中的國有成份已佔到，比方說，百分之六十，合作社及集體化成份佔百分之三十，私人資本佔百分之五，個體小商品生產佔百分之五。這樣的面目是否仍算是新民主主義呢？我們認為仍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即過渡期經濟），而尚非社會主義，因為它雖已快到社會主義，但究竟尚未完成過渡的旅程。可是它的構成顯然已與初期大不相同了。那時主要的經濟成份將是國家經濟和合作或集體經濟，而私人資本與個體小生產已降於極不重要的地位了。

由此可知，前文所舉三種經濟成份，只是指現階段的及新民主中國和平建設前期的情況而言，目前的東南歐各國和將來新民主主義後期的中國，經濟構成的面目是有些不同的。

個別地來考察各個經濟成份時，這裡作者只想提出國家經濟的基本特點來研討一下，關于其他經濟成份，由於篇幅限制，預備日後另文討論。那末所謂國家經濟，究竟包括什麼樣的內容？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講到內容，『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從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國家資本』，將構成國家經濟的主要內容，成為領導的經濟成份。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作者以為一般地把新民主主義

議國家經濟的來源只限於此種官僚壟斷資本，却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是「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的情形，接收過來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產業，只構成國家經濟的一個始基；從發展中去觀察國家經濟，它的內容將是更廣大的。即以勝利之初的情形而言，恐怕除四大家族爲首的官僚資本而外，還可能包括一部分與中國人民爲敵的帝國主義者的資產。

爲着加速擴展國家經濟之比重計，除這批固有產業實行積聚與擴大再生產外，主要地就要靠新民主國家動員全國國民資財的辦法了。

在新中國建設初期，由於國庫的貧乏，建設需要的浩大與急迫，加上帝國主義列強可能的封鎖或抵制，自力更生發展國家經濟的主要辦法，有賴于廣泛的吸收社會游資，動員全國國民資財，把它變爲建設的生產資金。實施這種辦法的具體方式之一，是發行公債，另一方式就是組織股份公司以實行「官商合辦」（國家與人民共同經營）。後一動員國民資財的具體方式的施行，在新中國建設初期，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國民資財中一部分將必然流入私人資本主義成份，另一部分則將爲國家經濟所吸收，而形成國家掌握和支配下的「官商合辦」的企業。這種「官商合辦」的方式，在新民主建設初期，不僅爲了解決資金問題而有必要，亦即爲解決管理技術人才問題，將更有其必要。因此，我們認爲在「國家經濟」這一範疇之下，可能

包括兩種程度上參差的國有經濟：一是「純國有」企業，一是「半國有」企業，即「官商合辦」企業。而後者又可說是特種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前者的所有權純粹屬於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工、農、小資產者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後者的所有權却祇有一部分是屬於這一國家的。雖然如此，根據股份公司組織的一般法則，大股東只須掌握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股權，即可自由操縱公司大權；何況新民主主義的「半國有」企業的大股東，是掌握政權而又操縱全國經濟命脈的國家。它的可能以少數股權去操縱整個企業，當然更不成問題。因此，從所有權一點講，「半國有」企業雖祇一部分爲國家所有，但從國家能充分操縱公司大權，掌握公司基本方針這一點上講，它却與「純國有」企業一樣，同屬於國家經濟的範疇。

不過必須着重指出，構成國家經濟之基本中心內容的，當然還是以從官僚資產階級及敵對的帝國主義者手上接收過來的產業爲始基的「純國有」企業；而國家資本主義性的「半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中僅處於輔助的地位；它在發展過程中是要不斷趨向「純化」的，亦即不斷趨向社會主義化的。

講到性質，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基本上無疑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爲什麼？因爲掌握此種經濟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的勤勞人民大眾的國家，是爲人民

大眾利益服務的國家。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光是這樣解釋國家經新的性質，究竟還嫌簡陋一點。

要說明國家經濟基本上的社會主義性，不但應從它的所有權（雖然這是根本問題）上去判斷，而尤應從剩餘生產物的分配情況上，從勞動力的性質上，以及從這種經濟的作用和目的上，去找證明性的解釋。從剩餘生產物的分配關係上說，「社會主義的工業是這樣一種工業，它的生產手段屬於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來自生產的剩餘價值歸於國家，國家則按照計劃而把它分配於（一）改善勞動大眾的地位，（二）擴大生產機關，（三）發展衛生、教育、文化等事業，（四）鞏固國家安全，及（五）供應國家的其他需要。」（註十）成爲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之中心內容的純國有企業，大體上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否定它的社會主義性，或者把它當作國家資本主義看，顯然是錯誤的。因爲這里大體上已無階級剝削，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生產物，是直接或間接用於保障勞動人民的自身利益上去了。然而它只是基本上社會主義性而尚非徹底社會主義性的企業。原因是國有企業所生產的一大部分商品，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必須通過市場，經過私人資本家的手推銷出去的。這樣一來，一定份額的剩餘生產物就仍舊恢復了剩餘價值的本性而爲私人資本家所佔有了。同時，國家企業還得購買原料及其他生產資料，這些東西也可能有一部份

要經過私人資本家的手來採購的。這樣，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中，又將包含着一定份額的商業利潤在內。因此，從剩餘生產物的分配情況來看，可知新民主主義的純國有企業，仍然含有一定程度的剝削的意味；固然這種剝削的意味將隨國有成份比重的逐漸壓倒和代替私有成份而逐漸消失，可是從大體上講，新民主主義的國有企業究竟只是基本上社會主義性的經濟。

勞動力的特質，也是決定某種經濟成份性質的重要標誌。例如封建制度下的勞動力——農民，他的人身從屬於地主而又與主要生產手段——土地不可分離。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力——產業工人（無產者），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這種勞動力的「自由」意味着與任何生產手段相分離，是一無所有的「自由」，是被剝削的「自由」，它是商品。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力的產業工人，不祇享有形式上法律上的自由，而且享有真正實質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意味着人對人剝削的完全根除，其基礎是生產手段的勞動人民公有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產業工人，已非原本意謂上的無產階級了。很明顯的，新民主主義國有企業里的勞動力，已不像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力那樣的完全與生

（註十）譯波蘭工商部長 Henry Mino 著「波蘭經濟與社會主義」一文，原文載一九四七年十月號美國「政事月刊」(Political Affairs)

產手段相分離，因為產業工人和其他勞動階層共同參與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的，他們是國有企業的集體所有者之一，他們在企業中完全處於主人的地位，他們基本上已脫離了剝削關係。他們的勞力已不是商品了；因為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已非常動力價值的表現；它既不決定於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又不代表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工人最低生活資料的價值。國有企業中的工資是在全部新創造價值中按照分配計劃而規定的逐年增長的一份，它以保證工人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為前提的。因此，說國家經濟的特質是「勞資（?!）關係採取工資形式」云云，是不正確的。第一，新民主國家并非資方；其次，工資已不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至於工資形式，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企業里都存在着「工資形式」，何以單成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特質呢？

至於這種經濟成份的領導作用和以發展社會主義因素，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為目的同樣可以證明它的社會主義性質了。

說明了成為國家經濟之中心內容的純國有企業的性質之後，所謂半國有企業的性質也就易於了解。我們前文稱它為「特種的國家資本主義」，其特殊性就在它是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重性質兼容并蓄的經濟；它是部分資本主義性的，因為他

包含大量的私人資本在內，因而存在着直接剝削剩餘價值的事實。它又是部分社會主義性的，因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操縱着公司大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為勞動人民國家所有，而又直接間接用於勞動人民身上，勞動力在這里亦已失去商品的性質；同時，它在發展中將逐漸轉化為純國有經濟，而且和純國有企業在一起，共同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因此，這一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即在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類似企業（在資本主義國家，這類企業都是十足資本主義性的）不同，他不是一個固定的存在，而是逐漸自我否定，逐漸社會主義化的。

我們所以不憚煩地來研討國家經濟的問題，因為它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領導成份，是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成敗決定關鍵。自然，這里所發揮的見解，雖比綱領性的東西要具體些，然基本上還多半是理論性的發揮；將來建設的實踐一定會提出千百倍具體的問題來。即以國家資本主義而言，除上述那種類型外，將來還可能發生別的类型，如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所試行過的租讓企業之類。但這種類型的性質，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基本上仍不外乎上述「官商合辦」企業的性質。

三 有關經濟性質的一些問題

這里我們想討論到這樣幾個問題：新民主主義應應屬

于那一個範疇——資本主義抑社會主義？能不能說它是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的體制？它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獨立的社會形態(Social-economic Formation)？

有些人說，新民主主義經濟應歸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因為第一，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作為這一革命之結果的經濟，顯然尚處於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內。第二，私人資本主義在相當長時期內將「有一個發展」，或「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諸如土地改革，剷除官僚資本與帝國主義，保護工商業等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政策，都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之發展的。

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的因素之一，就在它不只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且還要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它的經濟建設任務不只要讓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個發展，而且還要讓社會主義性的經濟成份（國家經濟與集體或合作經濟）有更大更快的發展。新民主國家在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之建設任務的過程中，同時又在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種種物質前提：如廣泛地發展生產力，特別是發展工業化，逐漸消滅貧困與落後，加強和擴展國家經濟的比重及其領導地位，加強對農民經濟的領導與改造等。

而且，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將不斷改變其面貌及各種成份間的相互關係。在其前期階段內，資本主

義成份的比重還相當大，可是在後期階段內，私人資本主義的成份是相對和絕對地日益縮小了。在那時，它雖已接近社會主義，但尚未走進社會主義，仍然還是新民主主義；一口咬定它屬於資本主義範疇，至此就更顯得不妥當了。

但也有人說，新民主主義經濟應歸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因為第一，它處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之下；第二，社會主義性的國家經濟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且成為領導的經濟成份；第三，從發展趨勢上說，它是逐漸揚棄資本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

這些都是事實，然而都只代表事實的一方面。事實的另一方面就是資本主義及私有小商品經濟在相當長時期內有相當自由的發展。特別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若不肯先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為中心目標就無法克服這種落後性；而要做到發展生產與繁榮經濟，單靠國家經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而就非遵循「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不可。但這四句口號本身并非社會主義的意味，而仍是資產階級性的意味。所以把新民主主義肯定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體制，也是不大符合事實的。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肯定新民主主義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論斷，意味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即所謂最低綱領的任務）的取消，大有陷入兩步併作一步走的「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反革命泥坑中去的危險。革命的馬列主義不容許羈

開當前歷史階段的奮鬥任務而坐安樂椅上修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一切超現實超階段的革命空談，不但無補於革命的實踐，而且只有幫助了反動。因此，肯定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隸屬於社會主義範疇，是不對的。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限確定他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說法是一樣有害的。

此外，還有一種看法，認定新民主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估優勢的經濟體制，如先前瓦爾加和艾倫所論斷者，那也是不正確的。瓦爾加強調「在新的民主國家中，例如在波蘭，南斯拉夫……，他們的經濟具有新的特點：大部分的工業生產手段移作國家的所有和管理，即是以國家資本主義估優勢！」（註十一）這里瓦爾加把新民主主義的國有經濟，看作了國家資本主義，完全抹煞了這種國有經濟的基本上的社會主義性，從而把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看成了國家資本主義估優勢的體制。這實際就是把新民主主義歸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見解。既肯定他是國家資本主義（仍是資本主義）估優勢的體制，無怪乎他要做出如下的結論來了：「不管這些國家中新型經濟的產生，如何地重要和巨大……這些國家的比重，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不大，而且他們暫時在本基本上也沒有改變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前途。」（註十二）

這里，正如蘇聯學者奧斯特洛維茨諾夫所指出（註十三），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純粹從量的觀點（「比重不

大」云云）去評估新民主各國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前途的作用；另一個更大的錯誤即在妄斷「基本上沒有改變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前途」。而這兩個錯誤的根源，都在於瓦爾加氏對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國家的性質判斷錯誤之故。既然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估優勢的，那末他們基本上還是資本主義（即使聲明他不是舊意義的資本主義，亦無補于事），因而他們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中當然只佔有不大的比重，而談不到什麼實質的作用。同時，既然他們基本上還是資本主義，當然談不到對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前途有所改變了。可是實際上，我們深信，假如說俄國的十月革命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上劈開了第一道大「裂縫」（Breach），那末東南歐包括九千萬人口的新民主世界的出現，顯然表示着資本主義體系上劈開了又一道新的大「裂縫」，有力地擴大并加深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否認新民主主義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前途的作用，就等於忽視新民主主義之為擴大和加深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大因素。

艾倫在其所著「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係本人所譯，

（註十一、十二）見吳清友譯本「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化」頁三四。

（註十三）請參閱「中華文化」第十九卷第二，三期內載「

蘇聯經濟學者論戰後世界經濟之變化」一文，頁四十三。

世界知識社出版)一書中，同樣肯定了國家資本主義佔着優勢，而且在這一點上他比瓦爾加發揮得更具體而更「精密」。爲着說明新民主國家的經濟基礎，他建立了自己特創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他認爲有兩種性質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一種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另一種是進步的、民主的。他寫道：「在一個特殊的國家和特殊的時期，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在他轉變爲他的反對物以前，可以起一種反動的、甚至反動得很野蠻的作用，如像德國的情形一樣」。『祇有當國家掌握在一個革命的民主聯合政府手裏，當國家雖尚非社會主義的，但已不再爲資本家所統治的時候，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才能够眞實地變成進步的東西，變成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註十四)

那麼究竟艾倫所理想的「進步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是什麼樣的東西呢？艾倫於引述列甫在「論可怖的災難及如何與之戰鬥」一小冊中的主張——「一個革命的民主政府，爲着保護民主的勝利，應該採取銀行國有，辛迪卡及一切獨佔事業國有，廢除商業專利特許，強制工商業組織卡特爾等措施」——之後，他接着寫道：「這些國家充分統制經濟的辦法并不是完全新的……這是一種建立完全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完全統制經濟——的計劃，但同時容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即在國有化的經濟部分內，列寧也不會倡議廢除私有權，因爲依照他的計劃，企業的

股票或證券是依舊保留在私人手裏的。國家是依舊職工會的幫助來經營和管理企業，但尚不廢除私有財產；而那些被迫參加卡特爾的資本家，仍舊保有他們產業的所有權。」(註十五)

讀了以上幾段摘引，可以看出艾倫持着兩個顯然不正確的觀點：第一，他把新民主主義的國有企業看作「國家充分統制經濟的辦法」，看作「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照他的意見，這是國家對獨佔資本家私有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這樣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既絲毫不觸犯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當然談不到我們前文所指出的基本上的社會主義性。第二，他幻想着兩種絕不相容的權力的生存：政治權力操在以勞動人民爲主體的革命民主國家手裏，經濟權力操在獨佔資產階級手裏。根據前一觀點，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運動就不應該侵犯獨佔資產階級的私有權，這是股票全部留在資本家手裏的「國有化」(?)結果國家變成獨佔資本家的義務經理了！根據後一觀點，彷彿掌握國家政權的勞動人民可以和平掌握經濟大權的獨佔資本家手牽手地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的！這樣一來，艾倫先生就創造了絕無僅有的歷史奇蹟。

(註十四) 錄艾倫著《拙譯本》「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頁二一九。

(註十五) 見前揭書頁二一八。

然而我們知道（鐵的事實也這樣證明），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人民民主政權，必須以徹底剷除獨佔資產階級（在中國是以四大家族爲首的官僚獨佔資產階級）之私有權而造成社會主義化的國家經濟爲基礎的；沒有這樣的國家經濟，新民主主義將會很快地退化爲資本主義或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如中國），而他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將變成一句騙人的慌話。其實列寧一再強調的，正是革命民主政權應該跟獨佔資本家做堅決無情的鬥爭，實行銀行托辣斯和辛迪卡的國有化（而不是替獨佔資本家代爲經營和管制），只是指那些非獨佔性的資本主義經濟而言的。

此外，把國家對私人經濟的任何統制措施一律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也是不妥當的。新民主主義之下的私人資本主義，當然不是絕對自由的經濟成份，他必須受到新民主政權的合理的統制；然而他并不因此即不成其爲私人資本主義（而變成國家資本主義）。正與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情形相似，當時蘇聯并存在着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兩種成份；而這一人資本主義成份，無疑地是受到蘇維埃政府之統制的。艾倫既把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看作國家資本主義，又把新民主國家的私人資本也看作國家資本主義，自然無怪乎他要將新民主主義經濟說成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了。

總之，瓦爾加和艾倫兩位世界權威學者，在新民主主義

經濟性質的估計上都曾犯了同樣的錯誤；值得欣慰的是他們大體上都已很快地接受了批評者的意見，放棄了自己原先的觀點。不過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下他們的錯誤觀點，仍有着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同時，艾倫的「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一書，儘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不正確，但正如蘇聯批評家庫士明諾夫所評斷，這書中分析世界獨佔資本及其作用的主要部分，却是材料豐富而分析正確的。

根據上文的剖析，可知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既不屬於資本主義範疇，因而也就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佔優勢的體制，同時亦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它「是」資本主義，同時又「非」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同時又「非」社會主義。我們說「是」資本主義，因爲它讓資本主義在相當長時期內獲得發展的機會，或至少在新民主主義建設期間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說「非」資本主義，因爲新民主主義將隨着社會化部分（包括國有，合作和集體諸成份）之不斷擴大而逐漸走向社會主義；換言之，它不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我們又說「是」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性的國家經濟，掌握着全國經濟命脈，居於領導的地位；而它還要不斷地擴大起來，引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說「非」社會主義，因爲新民主主義本身究竟還不是社會主義，它還容許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小生產的存在和發展。它是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型經濟。

那末它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呢？

我們的回答仍是辯證的。是獨立的，同時又非獨立的；不是一個歷史階段，同時又是一個歷史階段。從它的不隸屬於這個或那個社會經濟體制的範疇這點意義上講，新民主主義可說是一個獨立的體制。不過這個獨立的體制就其性質和趨勢言是過渡型的。但是它又不是像原始氏族制、奴隸制、封建制……那樣的獨立的歷史階段或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因為第一，它沒有一種代表性的生產方式（代表性不等於主導性），它是一個多樣性的逐漸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性的國有成份雖處於主動地位，但并非代表了新民主主義。不然的話，新民主主義就等同於社會主義了。第二，它又不像那些公認的社會經濟形態一樣，具有全世界的普遍性；新民主主義這種經濟體制，在英、美、法這類高度發達的獨佔資本主義國家，是無須採取的，儘管由於其他某種考慮，那些國家的革命政權，可能採取新民主主義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方式。作為經濟體制看的新民主主義，是比較缺少世界的普遍性的。在這種意義上講，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然而從新民主各國本身的歷史發展來說，新民主主義却又不不能不成為他們各自歷史中的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否認這一點，就會把他誤解成一種短暫性的政策，忽視了徹底完

成革命民主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最後有一點必須着重指出的，即新民主主義之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型體制，在其各種經濟成份中，國家經濟是盡着領導的作用；但整個地說，它的能否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能否勝利地完成這種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最主要的還是決定於革命的政權體系。這一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體系（除各級文武政府機構外，還包括各地各級職工會、農會、商會、文教學術界及其他人民團體與一切革命民主黨派），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最大決定性的經濟因素，正如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體系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定性的經濟因素一樣。國家經濟的領導作用，其他經濟成份的逐漸改造或轉化，社會化計劃化因素之戰勝無政府性及市場法則，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走向社會主義等等一切，如果沒有革命政權體系這一經濟因素的積極領導與奮鬥，恐怕一件事也做不成功的。

寫到這里，字數已經滿了一萬四千；篇幅限制，只好就此結束。可是僅僅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性質這方面，要談而未談到的問題還不少，如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與合作集體經濟的問題，計劃性與無政府性的關係問題，新民主主義的分配與積累法則及新民主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問題等，都只好留待另文討論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一日於香港。

輯文錄

1925-1937

這本文錄選錄的是胡奮先生在一九五至一九三七年間所寫的文章，共選八十六篇，外附錄二篇。這些文章，大半是社會批評和談修養問題的，它們最能代表先生的文體，最足以表現先生的精神，對今日的讀者有濃厚的興味，並且有直接的啓發作用的。



陶行知教育論文選輯 方與 編

近三十年國際關係小史 徐 著

世界文學欣賞初步 秦 著

東周列國志新編 林 著

店書活生

樓二號四十五中道大港發



帝國主義 與 中國政治

胡 著

要了解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不能不把帝國主義侵略者這個因素研究一番。本書是從政治關係上來處理這個課題的第一本著作。它着重說明了帝國主義怎樣在中國尋找和製造政治上的工具，中國統治者和人民對待帝國主義是怎樣的不同的，以及改良主義者對帝國主義的幻想會怎樣損害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在時間上是論述到一九二五年為止。

刊叢究研 具醫學



『理論與現實』叢刊 第二輯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

版權所有

★

主編者 沈 遠

出版期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

定價 每冊港幣貳元正

刊行者

新 中 出 版 社

香港天后廟道金龍台三號

總經理

香 港 生 活 書 店

承印者

中 原 印 刷 廠

香港干諾道中六五號
電話：三〇八二〇

第二輯 理論與現實叢刊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改革

沈志遠.....土地改革與發展生產力

許滌新.....中共土地政策之發展

史 枚.....論現階段中國土地改革
中國土地剝削關係底農化與農業生

狄超白.....產力底衰退

陳伯達.....近代中國地租概論

(港幣定價二元正)

573

341143

BC

1-53